

分类号: \_\_\_\_\_

密 级: \_\_\_\_\_

学校代码: 10418

学 号: Y140504003



赣南师范大学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 硕士学位论文

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菲律宾外交的区域转向研究

**The Study of Philippine Region-Oriented Diplomacy during  
The Macapagal Administration**

作者 姓名: 苏太华

学院 名称: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一级学科名称: 世界史

二级学科名称: 国际关系史

指 导 教 师: 朱大伟

二〇一七年六月六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赣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苏太华 签字日期：2017年6月6日

##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赣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赣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苏太华 导师签名：李伟  
签字日期：2017年6月6日 签字日期：2017年6月6日

## 摘要

独立后初期的菲律宾依然与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始终奉行“美国第一”的外交战略。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后开启了菲律宾外交寻求回归亚洲的政策，迅速调整了菲美关系，并大力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追本溯源，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崛起是菲外交转向亚洲最主要的动因。同时，菲律宾寻求自身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考量，也成为影响菲外交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马卡帕加尔政府给其后的菲律宾外交外交航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和深厚遗产。

论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着重论述前马卡帕加尔政府的对外关系。菲律宾这个新兴国家取得独立伊始，立即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以菲美关系为基轴，加入到美国的安全体系和经济体系中。在马卡帕加尔执政前的十五年，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另外，菲律宾与邻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孕育中发展的萌芽。

第二章讲述马卡帕加尔具体外交调整的过程。马卡帕加尔大幅度调整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关系，试图摆脱美国而进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在处理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时，马卡帕加尔及其所领导的菲律宾政府，努力尝试着与邻国，甚至远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建立友好关系，当然这一切都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过程。

第三章分析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菲律宾外交转向的历史和现实动因。这其中包括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推动，冷战背景下菲律宾安全挑战的考虑和东南亚地区格局的新变化对菲律宾外交调整的影响。综上所述，内因和外因，以及马卡帕加尔个人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外交的区域转向。

第四章叙述了马卡帕加尔当局留下的外交遗产。马卡帕加尔在执政期间所采取外交转向政策对此后的菲美关系和菲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时至今日，杜特尔特总统所推行的“背美向中”外交政策，无时不刻彰显着马卡帕加尔总统外交政策的印记。此外受到马卡帕加尔影响的马科斯总统，他所推行的“发展外交”，大胆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使菲律宾对外关系的发展又前进了一大步。

关键词：马卡帕加尔；区域；外交转向；民族主义

## Abstract

After independence, Philippines still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ways adheres to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unilateral foreign policy. Until after President Macapagal took office, he adjus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pidly, and developed relationship with its Asian neighbors vigorously, the Philippine diplomatic course was changed. The rising of nation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is the main motivation of Philippine's diplomacy to Asia. In addition, the Philippine's own security consideration is also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Philippines's Asian diplomacy. Macapagal has left a precious legacy to Philippines, which has influenced his successor.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focuses on the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former Macapagal government. The emerging state of the Philippines,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independence, immediately pursued a diplomatic policy that follow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joined the US security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based on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was to deal with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ifteen years before Macapagal's administration. In addition, the Philippine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ut also bre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ud.

The second chapter is about the process of Macapagal's diplomatic adjustment. Macapagal greatly adjuste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rying to get ri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hieve independent diplomacy. In dealing wit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Macapagal and the leaders of the Philippines government, trying with its neighbors, even as far as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o establish friendly relations, all of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the diplomatic process.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for the change of Philippines's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Macapagal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the Philippines security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landscape in the region of the new diversification all had effected on foreign polic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 and Macapagal own reason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diplomatic area.

The fourth chapter describes macapagal government left diplomatic legacy. The Macapagal administration adopted foreign policy to Philippine US relations and Sophia relation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to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esident Duthel Te's closest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re are president Macapagal's foreign policy marks.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Macapagal,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implemented the "development diplomac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Philippines's foreign relations have taken a step forward.

**Key Words:** Macapagal ; region ; diplomacy region oriented ; nationalism

## 目录

中文摘要 .....	I
Abstract .....	II
绪论 .....	V
第一章 前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菲律宾对外关系 .....	1
第一节 菲律宾独立后的菲美“特殊关系” .....	1
第二节 战后错综复杂的菲与邻国关系 .....	3
一、从友好到对峙的菲中关系 .....	3
二、从对立到缓和的菲日关系 .....	4
三、从有限接触到逐渐发展的菲律宾与东南亚邻国关系 .....	6
第二章 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外交转向 .....	8
第一节 对美关系的调整 .....	8
一、菲律宾独立日的变更 .....	8
二、马卡帕加尔单方面废除“美菲关系总协定” .....	8
三、美菲军事同盟的弱化 .....	9
第二节 对亚关系的发展 .....	10
一、马卡帕加尔的“亚洲意识”萌生与发展 .....	11
二、马卡帕加尔时期的菲律宾独立自主对外经贸的迅速发展 .....	13
三、“马菲印多”计划的提出 .....	14
四、沙巴主权争端及“马来联邦”构想的提出 .....	15
五、马来西亚计划与菲印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	17
六、区域安全的加固 .....	19
第三节 外交转向的限度 .....	21
一、菲美“特殊关系”的回潮——马卡帕加尔思想妥协的影响 .....	21
二、文莱起义和马印对抗的被动卷入——菲印关系持续波动 .....	22
三、菲马关系的频繁波动——“沙巴争端”悬而未决的影响 .....	24
第三章 外交转向的现实动因 .....	27

第一节 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及推动	27
一、民族主义运动下凸显的美菲矛盾	27
二、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发展	28
三、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发展	30
第二节 冷战背景下菲律宾安全挑战的考虑	30
一、越战的介入及对菲美同盟的影响	30
二、军事安全的考量	31
第三节 东南亚地区格局的新变化对菲律宾外交调整的影响	33
一、冲突到合作：东南亚一体化的曲折进程	33
二、菲律宾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认同与回应	36
<b>第四章 马卡帕加尔政府留下的外交遗产</b>	<b>39</b>
第一节 对菲美关系的后续影响	39
第二节 对邻国关系的持续影响	39
第三节 外交调整带来的新突破——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	41
结语	42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感谢语	

## 绪论

### 一、论文的研究意义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抛出“重返亚洲”口号与战略，菲律宾在美国的支持下肆意挑战中国底线，不断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使得南中国海问题愈演愈烈，尤其是阿基诺三世上台后实施的一系列反华行径，使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一个冰点。

2016年5月9日，罗德里格·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新一届总统，其外交政策动向，尤其是对美和对华关系未来走向问题，引起国际社会极大关注。有鉴于此，本文以对菲律宾外交的亚洲转向作为研究对象，尤其在当下南海问题复杂化的大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者对战后菲律宾外交的研究更多的是菲美关系演进的一般研究，而对处于菲美关系转向的关键时期——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菲律宾外交的研究则相对少见。战后初期，菲历届总统一直把菲美关系作为菲律宾对外关系的基轴。这种“特殊关系”<sup>①</sup>给菲律宾社会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菲律宾民族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一支重要且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强烈呼吁菲律宾实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马卡帕加尔在其任期内遂发起了一次寻找亚洲民族国家身份的外交运动。

从菲律宾独立开始，到马卡帕加尔执政前，菲历届总统一贯把菲美“特殊关系”作为菲律宾外交的基轴。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迅猛发展，推动着菲律宾实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转向亚洲”的外交政策。笔者试着从马政府及马卡帕加尔本人及其政府的政策实施着手，透过他的一系列政策表述，从而更深层次的认识这一过程对于菲律宾外交转向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第一，扩展和加强对菲律宾外交史的研究，了解菲律宾外交的发展脉络、演变过程、发展规律和现有特点，有助于了解在冷战背景下和世界民族主义运动大潮中发展中国家的独立自主外交进程。第二，菲律宾虽然在独立之后以菲美特殊关系为基石处理各种外交事务，尤其在马卡帕加尔上台之后，菲美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喷涌而出，摆脱美国的阴影和实现亚洲外交转向成为了

<sup>①</sup> Julian C. Madison, J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1961-1965: Was Ther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6, p129.

菲律宾社会的主流舆论,加强对菲律宾外交转向的研究,可以寻找和总结弱小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转向过程中,如何摆脱大国影响的一般规律。

(二)现实意义: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加强对菲律宾对外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从而增进中菲关系并实现国家利益,因为友好的中菲双边关系有助于周边的稳定,有助于为国家的和平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外交转向研究在国内仍处于尚未完全开发的研究领域,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只在一些相关论著和论文中有所论及,尚无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出版,下面就本论文在战后菲美关系和菲律宾与亚洲国家(地区)外交关系史的主要研究成果及各方的观点作一些简单的整理:

#### 1. 对战后美菲关系史的总体考察

就国内学界而言,到目前来看,中国学者对美菲关系的系统研究仍不太多见,只是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有所涉及。这一类著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学功的《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下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蔡佳禾的《双重的遏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著作对于菲美关系都有一定的阐述,能够进行一定的参考,但由于受到著作主题和篇幅的限定和制约,他们对这方面未能进行详细的探究而只是一般层次的概述。

#### 2. 菲律宾与亚洲国家(地区)的关系史的总体考察

在菲中关系方面,第一,相比大陆学者而言,台湾学者对菲律宾外交政策做了更多的探讨。如怀静如的《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陈烈甫的《菲律宾对外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菲律宾民族文化与华侨同化问题》(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菲律宾与中菲关系》(南洋研究出版社,1955年),刘艺田的《中菲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杜乃济的《增进中菲实质关系之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陈台民的《中菲关系与菲

律宾华侨》(香港朝阳出版社, 1985 年), 萧曦清的《中菲外交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 1995 年)等等。这里面陈烈甫的著作, 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 著作里非常详细地叙述了半个世纪以来中菲关系的发展史, 资料非常全面。如果总结来看, 上述台湾学者对中菲关系方面的论述, 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 首先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影响, 往往只局限于论述菲律宾与台湾的关系, 对于中国大陆与菲律宾的关系则轻描淡写; 其次是在研究方法上, 侧重于历史的描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来看, 大多为上世界七八十年代的成果, 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近些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中菲关系的探讨虽然日渐丰富, 但系统性和专门性的研究并不多见, 暨南大学的硕士论文《80 年代末以来菲律宾对华政策研究》(左晓安, 1998 年 5 月), 这篇论文主要分析了拉莫斯总统期间菲律宾的对华政策。吉林大学的时羽卓:《马科斯时期的菲美关系演变 1965—1986》(2007 年, 硕士学位论文), 给笔者的印象较为深刻。

在菲日关系史方面, 国内学者真正重视这一问题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这期间出了不少成果,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郭绍烈著的《日本与东盟》(世界知识出版社出, 1984 年), 这是国内目前较早且比较系统的论述关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著作, 里面大量涉及到了菲日间政治和经贸的发展历程。宋成有著的《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1995 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和冯昭奎主编的《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6 年), 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论述, 较为详尽, 菲律宾所占篇幅较大, 但由于缺乏一定的理论分析, 使得过程过多地侧重在史事层面的一般叙述。

对于菲律宾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关系史方面,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年版)一文在阐述 60 年代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与区域主义意识的发展时提到了东南亚联盟, 简单的介绍其成立的时间以及最终失败的原因和产生的作用。梁志明的《论东南亚区域主义的兴起与东盟意识的增强》一文也仅仅是简单介绍东南亚联盟的成立与成员。韦红的《20 世纪 60 年代初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受挫原因再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年第 1 期)一文从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经济利益、领导人行为等多方面对“东南亚联盟”和“马菲印多”这两个重要的地区组织的解体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而总结出当时制约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各种因素,

本论文在这两个地区组织问题上有所涉及，希望能借鉴前辈观点。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1. 对战后美菲关系史的总体考察

相比国内学界，国外学界特别是美国，对菲美关系的研究著述较为丰硕，先后有多部论著出版，这为笔者对马卡帕加尔之前的菲律宾外交航向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现做简单的梳理如下：

代表作有 H.W. Brands 主编的《Bound to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和 Stanley Karnow 主编的《In Our Image :America's Empire in the Philippines》（Random House,1989）。前者解读了美菲两国的档案材料等第一手材料，并且对近代以来美菲交往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论述。在具体的论述中，作者记述了战后菲律宾取得独立，但在社会治理上存在着相当腐败的表现，也记录了作者对母国美国干涉独立后菲律宾内政和外交的复杂和矛盾的情感，不过作他觉得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菲律宾的宗主国都要表现的“完美”。后者论述了自 1898 年菲律宾短暂的第一共和国到七十年代马科斯执政以来菲美关系的发展脉络。在具体的论述中，斯坦利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后，曾经依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去塑造新殖民地菲律宾，目的在于将菲律宾改造成一个西方式的亚洲国家，但最终的结果没有能让美国如偿以愿。其中最重要的根源在于美国错误估计这一目标的困难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菲的执政当局并没有多大改善。麦克阿瑟启用日据时期的旧官僚体系，包括第一任总统哈马斯，新成立的政府立刻镇压战争期间的抗日游击队和爱国运动；美国牢牢地把控着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并支持包括马科斯总统在内的各种独裁政府。作者的叙述性极强，内容确实丰富、解析也很充分，但对于菲律宾独立初期的美菲关系都仅是一般叙述，未能系统详尽地进行论述。

Golay. Frank 集美国与菲律宾两国的学者共同主编的《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Englewood cliff prentice-hall,1966）是一本非常夯实的论文集代表，其中着重论述了美菲之间“特殊关系”，值得后人借鉴。其中洛佩兹在自己的论文中阐述自菲律宾取得独立以后，仍然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中保持着特殊关系，事实上，菲律宾仍然是美国的殖民地，虽然名义上是独立的。奥库普兹的论

文是“菲律宾对外政策的现实”，其中详尽地论述了菲律宾做出外交政策的依据，首先与前宗主国美国保持着“特殊关系”，其次，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菲律宾是一个亚洲国家，在地理上，历史中都与亚洲国家有着更紧密的关系，所以菲律宾又极想与亚洲国家进行友好的往来，但邻国都认为菲律宾还是处于美国的“管控之下”，不能算作独立主权国家，因此拒绝与其来往。

Fernandez Alejandro M.在自己主编的《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ging of new relation》(Quezon city: Philippine union catalog, 1977) 阐述到菲律宾的外交理想，他指出菲律宾作为西方国家在东方土地上的一种很好的“民主”示范，可以给其他国家以榜样，并为亚洲和平做出一定的贡献，历史证明了，一切都是徒劳，因为邻国并不看好菲律宾。美国也认为菲律宾是一个只会无限索取，不懂感恩回报的“无耻国家”。另一方面，在菲律宾独立后的美菲特殊关系时期，从美国的角度出发，它该如何处理美菲内部关系。另外，作者探讨了美菲在政治、社会、军事合作问题，尽管作者认为“特殊关系”有并始终存在着，但美菲之间还是存在着相当多的矛盾。

## 2. 菲律宾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史的总体考察

有关菲中关系方面的相关著作，菲律宾学者研究成果还算丰硕。菲律宾大学法学院教授 Purification C. Valera Quisumbing 的 Beijing— Manila Detente: Major Issues—A Study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83)可能是目前为止研究中菲关系最为系统的一本著作。作者适当的把中菲关系放在冷战的背景下，以宏观的角度来详尽地探讨了大陆和菲律宾外交关系，从对立到缓和以及建交，不足的地方是书中涉及的战后初期的中菲关系并不多。作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使用了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关联政治”(linkage polities)理论。另外，Bernardita Reyes. Churchill 主编的 An Assessment: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1975-1988 (De La sall university press ,1990)，其中收录的文章则探讨了中菲关系的某段历史时期，其研究角度主要侧重于经贸双边关系的影响，如 Corazon Patarata 的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Philippines: trade , Economic ,Culture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nes Quisumbing 的 Expanding Philippine—China Economics Ties 等等，也为本人的研究提供一手的菲律宾学者的研究资料。尤其

是 Aileen S.P. Baviera 的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Strategic Issues in Philippines—China Relations* (Philippines—China Development Resource Center,2000), 则专门论述了中菲关系之间的一些战略性问题。

关于菲日关系史,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比较丰硕。市村真一主编《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关系》(北大出版社, 1995 年); 信夫清三郎主编《日本外交史》(上、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92 年); 奥尔森著《日本在战后亚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等, 另外在一些通史类书籍中也会提到, 例如 D.G.F.霍尔:《东南亚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译, 1982 年)。

相比于国内研究, 国外对东南亚联盟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文森特·凯利在《东南亚联盟(1961-1967):区域主义, 意识形态, 宣示性的外交政策》中, 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东盟的缘起, 以及它的长期而又宏大的发展方向, 以及在东盟开始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 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冲突, 理解与对抗论述的很充足, 也是我们能够清楚的把握东南亚联盟的整个发展脉络。一方面从区域主义发展这个视角来研究东南亚联盟的动因和缘起,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尤其美国的态度是不容忽视的。朱莉克莱因的《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前提:东南亚联盟》中强调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前提是东南亚联盟。文中涉及到马来西亚联邦的建立、和马印对抗、文莱起义以及菲律宾对沙巴领土的主权声索。

### 三、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本论文是对菲律宾外交转向的研究, 与前人研究相比, 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定的特色和创新: 第一, 视角创新。已有研究成果关于美菲关系的研究多侧重于从美国单一的视角出发, 而笔者试图从多个国家多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探讨战后美菲关系对菲律宾的影响。第二, 内容新颖。首先关于菲律宾民族主义的研究, 以往多侧重国内经济方面, 在外交方面研究较少, 笔者尽可能的运用历史分析法来探讨菲律宾民族主义在其外交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其次, 放在冷战背景下, 同时考虑东盟的演进过程对菲律宾的外交转向影响, 也是本论文试图寻找的一个创新点。第三, 在文献搜索过程中, 笔者发现战后菲律宾外的各个阶段外交史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 在脉络上却有着鲜明的断裂性, 但同时也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文献, 本论文试着整合这些前人研究的成果, 使菲律宾的外交转向在脉络

上更加清晰，能更好地去观察和探析外交转变的这一过程。

#### 四、采用的研究方法

本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为主，并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与点拨下，将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与我自身的思考结合起来，结合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菲律宾国内外形势和其外交调整的具体表现，对菲律宾亚洲外交转向背后的历史动因进行相对深入地分析，并通过外交转变给菲律宾带来的影响，最后综合给予马卡帕加尔政府合理的历史定位，综合评价其给菲律宾外交留下的历史遗产。下面简单介绍这几种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通过对文献的检索分析来寻求问题的定位以及研究的方向。文献分析法作为一种非实验性的研究方法，主要借助于图书馆、档案馆、网络等渠道所收集的资料进行研究，包括国内外学术专著、期刊论文等。

（二）比较分析法。将菲律宾20世纪60年代的前后的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进行纵向的比较研究分析，并将菲律宾的20世纪60年代的菲美关系和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而不仅仅局限于发生于60年代的最直接表层现象。

（三）数据/计量分析法：用数字的直观形式反映客观状况，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分析。

（四）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文化学、地缘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成果，以多维视角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观察。

#### 五、研究目标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研究目标：

本论文采用文献分析法，辅以当事人的主要演讲、档案资料和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马卡帕加尔总统领导下菲律宾政府时期的一系列外交调整进行深刻的解析和整理，从而进一步探析和发掘菲律宾政府外交的亚洲转向背后的动因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通过自己的研究，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第一，美菲“特殊关系”的特殊之处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和战后菲律宾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处于怎样的位

置。第二，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外交调整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第三，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其外交转向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第四，东南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在马卡帕加尔执政时期是一种怎样的演进？第五，马卡帕加尔政府给菲律宾留下来哪些外交遗产。

## 第一章 前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菲律宾对外关系

### 第一节 菲律宾独立后的菲美“特殊关系”

菲律宾这个新兴国家取得独立伊始，立即奉行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以菲美关系为基轴，加入到美国的安全体系和经济体系中。在马卡帕加尔执政前的十五年，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美国给菲律宾提供战后经济援助、商品输出市场和各种军备，菲律宾则以美国优先使用自然资源、优惠的资本输出市场和军事基地来回报<sup>①</sup>。但是菲美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以不平等的姿态出现，尤其在经济领域，菲律宾对美严重依赖，长期出现贸易逆差，美国则牢牢的掌控着菲律宾的经济命脉。

菲律宾对外贸易逆差（1956—1958）<sup>②</sup>

年份	菲从美进口 (亿比索)	占菲进口总 数 (%)	对美出口 (亿比索)	占菲出口总 数 (%)	贸易逆差
1956	6.01	59	4.89	54	1.15
1957	6.74	55	4.52	52	2.22
1958	5.84	52	5.49	57	0.35

菲律宾第一任总统哈罗斯在就职演讲中这样说道：“其他的殖民地是从没落的列强手中独立出来，而美国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所以菲律宾这只小船要紧紧的跟随美国这只大船<sup>③</sup>”。可以看出菲律宾政府对美国既畏惧又依赖的心理，而接下来菲律宾要做的就是将这种“特殊关系”变成相互依赖。除了经济的紧密联系外，菲律宾更希望在军事安全上得到美国更多的庇护，而现实中菲律宾最为担忧的是来自国内外共产主义的威胁。在菲律宾独立的过程中，菲律宾的民众普遍希望在政治上获得独立，而军事上希望加强与美国的联系，这样既可以实现民族自决的愿望也可以避免强邻的威胁，因此菲律宾积极甚至主动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同盟协定，这其中包括《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菲律宾俨然成为了美国战后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的麦克塞塞总统和加西亚总统也很满意菲律宾这样的定位，一方面意味着菲律宾的国际地位有所提

<sup>①</sup> [台] 怀静如著. 菲律宾外交政策: 1946-1984 [M].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第 40 页。

<sup>②</sup> 晏穆里. 菲律宾的经济 [J]. 远东经济评论, 1960, 29, (8-9).

<sup>③</sup> W. Scott Tompson. Unequal Partners [M],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D.C: Health and Company, 1975, p6.

升，这样可以在国际上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在处理东南亚问题上越来越不能忽视菲律宾的作用；另一方面，菲律宾与东南亚国家交流更频繁了，离孤立的时代渐行渐远。但是随着冷战的加剧，菲律宾不可避免的卷入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去，可见同盟条约是一把双刃剑，它间接地加剧了菲律宾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国内民众的反美情绪在不断的蔓延。

与美国的“历史关系”仍然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重心，自 1946 年以来一直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似乎是长久固定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主要的菲律宾人领导层开始计划他们国家未来的外交政策，因为罗斯福总统在 1935 年承诺接下来十年的时间给与菲律宾独立，他们所构想的是一个亲美的并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的政府，日本随后发动的战争结束了所有这些理论。伴随着美国对于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复杂安排下，菲律宾于 1946 年的 7 月 4 日获得独立。刚刚获得独立，菲律宾立刻尾随新兴的美国安全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美国经济。美国是菲律宾迄今为止，出口和进口的最大的海外市场。这样的观点早在 1964 年的时候，就被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的研究小组所发指出。<sup>①</sup>George E. Taylo 在《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这本书有几段关于人口过剩、农业、教育的需要，菲律宾知识分子的角色，中产阶级，和军事等话题，无不与美国有关系。有时候，菲律宾很可能会觉得这不仅是书里面，连共产主义国家都认为“老大哥在看着你”。

菲律宾声称要追随美国自由世界的旗帜，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菲律宾自称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民主国家。美国在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欧洲推行自己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任务，亚洲并不在美国的主要考虑范围内，因此菲律宾成为了美国式“民主”在亚洲的形象代言人，但它很不成功。它不仅缺乏资源，还有竞争对手。印度声称自己是新的亚洲民主国家模范的主要角色，并怀疑菲律宾的“民主”，并且声称在菲律宾申请工作的难度很大，这也可能是菲印关系在早期并不友好的根源，直到马卡帕加尔执政后，这局面才有所好转。从朝鲜战争开始和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菲律宾一直保持接近她的美国盟友，她成为亚洲国家中，为数不多的派出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国际社会用各种方式，疯狂的斥责“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对内则残酷地镇压“胡克运动”。菲

---

<sup>①</sup> George E. Tayl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 [M]. New York, Praeger, 1964.

律宾也受到了广泛的国外援助，主要是来自美国。直到马卡帕加尔执政，菲律宾没有与任何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菲美关系从一开始就蕴含了不稳定的因素。首先是结构的的不稳定，菲律宾刚刚独立，就同美国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其中包括“贝尔贸易法案”、“美菲总关系条约”和两个军事协定——《美菲军事基地协定》和《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协定》。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希望通过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格局，在政治和外交上，使菲和自己保持一致政策立场，强化两国之间的主从关系。由于菲美间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差距，菲律宾依然保持为美国的“殖民地”，所以菲律宾虽然独立了，但是它的主权范围被美国严格的限制了<sup>①</sup>。弗兰德斯·阿尔钱德勒的《菲律宾与美国：塑造新的关系》<sup>②</sup>一书中指出，菲律宾自独立以来一直乐于把美国的自由理念展示给亚洲国家，并力图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但事实证明这很不切实际，因为亚洲国家不把菲律宾当做完整的主权国家看待，认为其是美国的仆人。其次是，菲美关系存有更多的反动因素，与菲律宾民众的意愿背道而驰。美国积极支持菲律宾的专制政权，以罗哈斯为首的第一届菲律宾政府成员大多是亲美派系。在美国的操纵下，刚成立的政府立马执行追随美国和反共的路线，在镇压国内民主运动方面毫不手软，许多进步人士和二战时人民抗日军家属被杀害，这些暴行加重了菲律宾人民的反美情绪。

## 第二节 战后错综复杂的菲亚关系

### 一、从友好到对峙的菲中关系

有史料可查的最早记录，在中国东汉时期，菲中就已经有联系，之后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和政治的频繁交流。到了近代以后，这种联系更加紧密了，孙中山在中国进行的民主革命，得到了以阿奎那多为首的菲律宾革命政府大量的经济援助，二战期间，中菲两国在抗日斗争中并肩作战，菲律宾国内甚至有一支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抗日支队。这一时期的菲中关系不仅延续了友好的传统，还成为战时盟友的关系，虽然当时菲律宾完全并未独立，但各阶层人民都对中国遭受日

<sup>①</sup> Fifield. Russell Hunt.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8,p60.

<sup>②</sup> Fernandez Alejandro M.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ging of new relations [M]. Quezon: Philippine union catalog, 1977.

本侵略表示同情。战后的国民政府继续与菲律宾保持着友好关系，承认菲律宾独立，并于 1947 年 4 月 18 日，与菲律宾政府签订友好条约，但在华人问题上存在分歧，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溃败，菲律宾与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开启了新一轮的反共联盟。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菲律宾对立刻执行敌视大陆政权的外交方针，对共产主义中国不予承认，而与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持着“外交关系”，这种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很大程度上因为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及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相比，如泰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对华政策国家最为严厉，在冷战初期，菲律宾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坚决不承认中国大陆政权。但在 1949 年 10 月 10 日，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上海的菲律宾总领事馆，向菲当局传达了希望建交的意愿。在季里诺总统访问美国期间，被问到与中国关系的时候，他说道，承认大陆政权将是必然的，但承认时间仍在考虑之中，可以看出来，菲律宾国内有一种模糊的中立主义倾向。遗憾的是，此时菲律宾国内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胡克运动”愈演愈烈，菲律宾当局怀疑其背后有中国的支持，同时国际上也不太平，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遂介入这场东北亚热战，菲律宾彻底放弃了模糊的中立主义，开始了与中国长达 20 多年的对峙状态。之后的麦克塞塞总统，加西亚总统和马克帕加尔总统仍然采取敌视中国大陆的外交政策，直到马科斯上台以后，这种情况才得到根本改变。

菲律宾领导人认为最近的北方邻居是台湾，而不是北京政权。与蒋介石政府的政治关系一般，但是，双方都减少了不友好的宣传，同时，双方的战略利益引人注目，发生在 1954 年和 1958 年的台海危机，使菲律宾与台湾做了相同的战略举动，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北越政权施行敌对行为，并对华盛顿表示支持。

## 二、从对立到缓和的菲日关系

战前，菲律宾由于是美国在亚洲重要的战略堡垒，因此成为日本进攻的重点，在整个二战期间，菲律宾损失惊人，以至于战后艾森豪威尔访问马尼拉时说道：“除了华沙以外，这是我希望看到的破坏最严重的城市。”在战后菲律宾国内仍然存在一股反日情绪，民众始终无法从和平中稀释掉对日本的仇恨，而菲律宾政府也担心，一旦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菲律宾将会首当其冲，再次成为受害者，当美国采取扶植日本的政策时，菲律宾反应激烈，国内发行量最大的《马尼拉时报》，

这样评论道““任何试图在经济和军事上帮助日本,使其可能再次成为太平洋和平安全威胁的行为,将遭到菲律宾的激烈反对”<sup>①</sup>,这也是战后初期,在菲美“特殊关系”背景下,菲律宾唯一不能苟同美国的外交政策。

菲律宾要求日本赔偿 80 亿美元,作为旧金山对日和解谈判的基础,在美国的斡旋下,菲律宾最终接受了日本 5.5 亿美元赔偿和 2.3 亿美元的商业贷款<sup>②</sup>,从此与日本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就在菲美因日本战后赔款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军难以挽回溃败的局势,美国开始采取扶植日本战略,对抗共产主义控制的大陆,平衡东亚的格局,菲律宾基本认同这一对日政策,因为在菲律宾看来,对日和解有两个好处:首先,日本给与菲律宾的赔偿,可以用来恢复和发展菲律宾的经济。其次,同日本化敌为友,可以多一重安全保障,与日本共同防范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美国则向菲律宾保证根除日本军国主义,使其不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sup>③</sup>,以消除美律宾对于日本再次崛起的担心。

日本的赔偿额 (1957—1962) (单位: 百万美元)<sup>④</sup>

项目	全部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总额	226.62	20.70	23.36	24.00	38.69	9.87
商品	105.20	20.70	16.57	22.54	36.17	9.22
政府部门	33.44	16.65	9.55	6.11	0.49	0.64
私人部门	71.76	4.05	7.02	16.43	35.68	8.58
劳务	11.42	——	6.79	1.46	2.52	0.65

之后菲日两国经济互动频繁,贸易额逐年上涨,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战后菲律宾第二大贸易国。1957年,日本首相岸信介访问日本,第二年,菲律宾加西亚回访了日本。种种迹象表明,菲律宾与日本的关系已从战时和战后初期的对立,逐步走向了友好,日本甚至是变成了菲律宾潜在的盟友。

<sup>①</sup> CPR to oppose Japan build up[N].The Manila Times, February 18,1948, p.3

<sup>②</sup> Golay, Frank H.The Philippines: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311.

<sup>③</sup>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Far East, 1942-1946[R].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501-503.

<sup>④</sup> J. L. Vellut. Japanese Reparations to the Philippines[J].Asian Survey. October 1963,p501.

日本和菲律宾关系亲密但发展缓慢, 尽管马卡帕加尔上台后, 菲律宾与日本的贸易在贸易重要性仅次于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军犯下的暴行仍历历在目, 并且是战后菲律宾对日本猜疑的一个主要原因。直到 50 年代菲律宾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依然表示担忧, 而 1951 年的《美菲共同防御协定》的签订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菲律宾一些安慰,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日本以及中国的扩张。菲律宾希望得到日本大量赔款, 但美国有时候会试图说服菲律宾友好的对待自己的盟友。

虽然菲律宾对日本持续的不信任, 但菲律宾与日本已经建立了无比强大的经济关系。与日本的关系, 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菲律宾经济, 加西亚任内还通过了了参议院搁置三年未能批准通商航海条约草案。许多菲律宾人担心这将给予日本大企业太多的机会进军菲律宾内地, 他们觉得需要把更多的保障写进条约。日本知道菲律宾的敏感, 并耐心地, 有效地缓和并取代两国间不愉快的记忆。当菲律宾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与日本的和解, 他利用的是战后初期, 日本的极度防御的外交立场。日本在东南亚的争端中保持谨慎的中立, 同时, 当争议双方寻求和解, 随时在东京提供会议设施。在东南亚的日本经济活动正在蓬勃发展, 并采取多种形式。例如, 日本“和平队”将很快开始在菲律宾的工作。

### 三、从有限接触到逐渐发展的菲律宾与东南亚邻国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 东南亚独立的国家仅有泰国、越南、老挝和印尼四国, 菲律宾于次年独立, 而随后越南、老挝和印尼遭到战前殖民地宗主国的反扑, 因此能与菲律宾形成互动关系的东南亚国家是极少的, 在美国的影响下, 这种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的发展, 也呈畸形的态势, 亚洲国家并不把它看成一个外交独立的国家, 而菲律宾同样不把自己的邻国当成外交重点对象。时任菲律宾国会参议员的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形容自己的国家: “虽然它与它的邻居有血缘关系, 但可笑的是, 在它的周围却没有一个朋友。”<sup>①</sup>有鉴于此, 麦克塞塞总统特别强调与自己邻国的关系, 他在第一次国情咨文中这样讲到: “作为东南亚国家的邻居, 我们期望参与这个区域的活动, 这将促使我们与邻国之间更加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sup>②</sup>

<sup>①</sup> FIFIELD. RUSSELL HUNT.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8, 84.

<sup>②</sup> FIFIELD. RUSSELL HUNT.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M].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菲泰关系是东南亚双边关系中，堪称友好的典范，双方于 1949 年建交，泰国积主动参加了成立于菲律宾马尼拉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之后还积极参与由菲律宾倡导的各种东南亚区域组织，菲泰双方在集体安全合作方面有着强烈的共识。菲马关系则是一波三折，因为沙巴领土归属问题引起两国的争端，使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实现关系正常化进程缓慢，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菲律宾与印尼的关系发展，在战后初期并不那么顺利，这与两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印尼总统苏加诺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奉行反帝反殖的对外方针，与时任菲律宾总统的加西亚，所执行的亲美政策，有着天然的矛盾，再加上当时印尼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爆发叛乱，印尼当局指责菲律宾有暗中支持叛军的嫌疑，两国关系一度紧张<sup>①</sup>。

自从 1946 年以来，与泰国的关系一直是温和的不承担义务的友谊，两国都依赖美国，自 1954 以来，他们也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泰国甚至不是菲律宾的主要贸易伙伴。仅自 1960 年以来一直保持积极的关系，并奉行一个共同的政策，就是追随美国对老挝和越南北方施行“强硬”政策。在 1961 年，这两个国家合作发起成立了东南亚联盟（ASA），但其平稳的进展很快就被菲律宾和第三个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打破，这个国家就是马来亚。随后，泰国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并成为马菲印多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之间的调解人。他过也是唯一一个同时与马菲印多成员国建交的国家，在保持区域稳定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独立后的菲律宾在外交方面，坚定的执行跟随美国和反共的路线，它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而与南越政权，韩国和台湾“建交”，随着共产主义不断取得胜利，菲律宾开始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菲律宾当局，尤其是麦克塞塞总统任期内坚决反对中立主义<sup>②</sup>。菲律宾希望在美菲同盟以外，与东南亚国家建立更为广泛的安全机制，最终促成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产生。对于菲律宾而言，这是国家安全层面的双层保险，同时也开启了菲律宾参与亚洲事务的道路。

1958, 85.

<sup>①</sup>金应熙. 菲律宾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716

<sup>②</sup>[台]怀静如著. 菲律宾外交政策:1946-1984[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103.

## 第二章 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的外交转向

在马卡帕加尔上台之后，菲美之间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1962年集中爆发的战争赔偿问题，不平等的经贸关系问题，美国投资带来的资本侵略问题<sup>①</sup>和围绕美军事基地持续争论问题等，这些都加速了菲律宾对“特殊关系”幻想破灭的进程和外交政策调整的速度。在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的影响下，如何恰当的处理菲美关系，这是摆在马卡帕加尔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非常谨慎的进行。

### 第一节 对美关系的调整

#### 一、菲律宾独立日的变更

马卡帕加尔在1962年宣布将菲律宾独立节从1946年规定的7月4日改为6月12日<sup>②</sup>，这个日子具有特殊的意义，半个世纪前的同一天菲律宾向世界宣告独立，这个改变得到菲律宾社会各阶层的支持，被视为外交调整的开端。这种象征性做出的改变，标志着菲律宾开始脱离以美国为中心，驶向亚洲外交和友谊的轨道。马卡帕加尔说这一改变的宗旨是为了“未完成的革命”<sup>③</sup>，这样能同广大的亚洲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历史文化的命运共同体。就在不久之后，他又发表演讲说道“我们对政策的一个重新定位……菲律宾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共同体”<sup>④</sup>。紧接着当美国拒绝为战争损失补偿增加拨款时，他决定延迟甚至后来取消了对美国的友好访问。

#### 二、马卡帕加尔单方面废除“美菲关系总协定”

马卡帕加尔单方面废除“美菲总关系条约”。“美菲总关系条约”是在菲律宾独立的那一天，由罗哈斯总统和美国首任驻菲大使麦克纳特签订的，是一个很不平等的条约，条约在表面上披着“自由，平等”的外衣承认菲律宾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实质上是把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条约里甚至连内容都极其苛刻，比如“菲律宾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美国将全权代表菲方利益”和“菲

<sup>①</sup> Martin Meadow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in Emergent Nationalism[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p509.

<sup>②</sup> 1898年6月12日菲律宾独立革命领袖阿吉纳尔多发表《独立宣言》宣告菲律宾独立。

<sup>③</sup> President Macapagal's address at the Conference of heads of governments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Republic of Indonesia and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July 30, 1963, Manila.

<sup>④</sup> Man Mohini Kaul.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J].India Quarterly 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6, p35.

律宾政府将承担美国殖民政府时期的全部债务和义务”。这样“儿戏”<sup>①</sup>的独立条件，可见在当时是多么不得人心。为了在强大的反美浪潮前赢得人心，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显然是必要的。尤其在条约和几个协定中涉及到的经贸问题，是战后一直以来菲律宾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它最大限度的掠夺菲律宾的资源，严重影响到了菲的民生问题。马卡帕加尔在上台后一年后的国会中明确提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菲律宾的政治讹诈，“尽管我们优先关注道德的再生和经济增长，我们对所有其他公共服务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现在停下来，在政府的重要领域，致力于对人民负责。随着公开宣称的目的是提高我国国际信誉等级，为了维护和提高职业服务，改革已经在对外事务部进行。外国服务的政治讹诈被坚决抵制。”<sup>②</sup>这种以经济援助为饵，以期达到政治目的，是这个时期菲律宾民众和领导层都难以接受的。

### 三、美菲军事同盟的弱化

众所周知，菲律宾是为数不多的，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国家，尽管这一决定几乎完全是她与美国关系密切的结果，鲜为人知的是，菲律宾当时还坚持起草一个太平洋宪章，里面充满了当时亚洲人民的意愿，如“平等的权利和人民的自决”。这是菲律宾寻求亚洲同盟的第一步，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菲美签订《菲美共同防御条约》，菲美同盟正式确定，紧接着《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的签订，菲美同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但是随后菲美关系出现波动。作为曾经普遍的美国观，这表现在短语“你要么是我或反对我，没有真正的中间位置”，而菲律宾外交寻求推动自己在东南亚的领导地位，因为他在美国和东南亚条约组织面前总是从属的地位。然而，越战爆发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和困难：马卡帕加尔并很容易，与不结盟运动著名领导人苏加诺相处，同时，与林登·约翰逊和东姑阿都拉曼相处也不是那么协调。总有一些矛盾刺激着菲美之间的亲密关系：一些菲律宾人对美国的马尼拉麻囤货感到焦虑；菲律宾纺织业对美国进口限制感到愤怒；糖业集团希望在美国市场拥有更大的配额。一些美国人担心模棱两可的有争议的零售业国有化法律和 1954 年劳雷尔——兰格雷协议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两国共同的经济优惠和特权被逐渐取消，这个过程在 1974 年最终完成，

<sup>①</sup> M. Quezon. Good Fight [M].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Press, 1946, p151.

<sup>②</sup> State of the Nation Message of President Macapagal, January 26, 1963.

然而这些只是非常短暂的问题，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涌现，菲律宾对美亲密关系也在逐步消失。

越战期间，美菲双方围绕菲律宾出兵越南问题展开一系列交涉，马卡帕加尔政府与马科斯政府先后对约翰逊政府提出不同的出兵“补偿”条件。围绕着这些条件，美菲双方展开激烈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从美国方面而言，寻求菲律宾政府尽快向越南派兵，表明国际社会对美国越战政策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分别是约翰逊政府对菲方大部分条件做出让步的直接动机与深层次动机。从菲律宾方面来看，对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完全依赖是其无法拒绝美国提出的出兵要求的深刻原因，而避免直接大规模卷入越战则与自身利益有关，选择只派遣少量民用工程兵部队入越是菲律宾平衡各种利益之后的折中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只派遣少量民用工程兵部队，而始终拒绝派遣战斗部队，寻求美国大规模增加资金“资助”与军事、经济援助，实际上是菲律宾在出兵越南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寻求“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手段。美菲双方的上述行为与动机从一个侧面凸显出越战时期美菲同盟关系的复杂特征。越战的爆发加速了菲律宾政府内部的分裂，参战与不参战，在菲律宾国会已经开始有火药味，但是作为菲美同盟的承诺，菲律宾还是被迫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战火不仅燃烧了越南，同样撕裂了菲美同盟，但菲美之间非常强大且相互便利的信任感依然存在，只是军事同盟弱化了。

## 第二节 对亚关系的发展

在菲律宾政治家的演讲中，都会多少出现一些地缘政治理论。一个经常被提到的主旋律就是，菲律宾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岛屿和基地，对中国东南沿海形成了围堵。当然，几乎所有的菲律宾人都知道在海上，是由美国第七舰队提供保护。直到1964年1月，马卡帕加尔总统在马尼拉扶轮社前发表了一次典型且温和的，有关地缘政治学说的演讲，在他的讲话中，谈到了需要有“我们的直接地理意识”，“不可回避的事实，我们在亚洲和也必须属于亚洲”。这是在公开场合，马卡帕加尔第一次把眼光投向邻国。他还谈到了在美国和苏联主导的体系

中的联盟关系有了明显的松动，他认为第三世界正在崛起，甚至可以在非洲需找新的朋友。

### 一、马卡帕加尔的“亚洲意识”萌生与发展

在 1946 年独立后的二十年内，菲律宾外交政策和国家的态度已经慢慢的贴上了亚洲主义的标签。菲律宾独立于 7 月 4 日，这一天也是美国独立周年纪念日。从此它走上了具有明确的冷战路线的外交政策，这表现为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对以苏联为代表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恐惧，和从“光荣孤立”的态度转向亚洲。罗哈斯总统极力排斥亚洲主义并宣称菲律宾外交重心是美国，并呼吁菲律宾人“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们与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亲密关系”<sup>①</sup>。但是“亚洲主义”却在菲律宾领导人的心中慢慢的发展起来。

在一开始，时任外交部长的佩雷兹就表明马卡帕加尔的“新时代”政府，将推动菲律宾外交政策进入新的亚洲轨道的迹象，是超越政治的联盟。佩雷兹说“过去太痴迷于亚洲的政治外交，常常，我们忘记了强劲的且长期存在的社会和经济关系，这些是构成许多政治上层建筑的基础。”<sup>②</sup>在他看来，“生长在亚洲”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力量，使亚洲人聚集在一起“对抗那些试图让我们存在分歧的冲击”。三个因素影响这一转变。第一，亚洲意识在菲律宾崛起，并发展壮大，菲律宾开始寻找在亚洲的新角色，来给自己定位。第二，菲律宾领导层的个性深深地影响着菲律宾的外交政策的实施。第三，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处理影响着菲律宾融入亚洲的进程。随后菲“亚洲主义<sup>③</sup>”思潮迅猛发展。随着对美关系做出的调整以及有可能面临美国给与的空间压力，尤其是经贸方面，菲律宾越来越重视同自己邻居的关系，为了改变菲律宾在国际上的形象，马卡帕加尔政府在“回到亚洲”的口号下与东南亚的国家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菲律宾的“亚洲意识”在这个时间段显得很强烈，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是一直以来挣扎在过去的民族主义的结果<sup>④</sup>”。“亚洲主义”意味着菲律宾要承认它是亚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地理因素，菲律宾与亚洲国家存在地缘政治；第二，历史因素，菲律宾同亚洲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被侵略的历史。基于两方

<sup>①</sup> State of the Nation Message, January 27, 1947.

<sup>②</sup> speech by Pelaez on 'New Horizons for our Foreign Policy' on February 8, 1962.

<sup>③</sup> Usha Mahajani.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Asianism [J]. Asian studies, August 1965, p221.

<sup>④</sup> Usha Mahajani. The Development of Philippine Asianism [J]. Asian studies, August 1965, p222.

面的认识，马卡帕加尔可以说在亚洲互动方面不遗余力。1962年10月，马卡帕加尔在马尼拉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表明要同临近的东南亚和大洋洲各国建立更多更广泛的联系，还要同日本、西欧和拉丁美洲加强经济联系。

包括菲律宾现在的外交政策的关系范围，在总统马卡帕加尔第三年度国情咨文被表明，于1964年1月27日在马尼拉被递交国会联席会议。短短三个段落给最近政府的外交政策记录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

我们的国家在过去两年的国际关系领域的行为，其特征是更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在东南亚事务。我们愿意接受挑战，在我们的世界的输入民主；我们在马来血统民族的联盟—马菲印多发挥了突出作用；我们对沙巴的诉求取得的进展（沙巴岛）；我们曾协助调解国家之间的争端。我国和美国之间形成了持久的重要性的关系，以及和包括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以及中华民国等亚洲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班牙，墨西哥，和非洲等新的国家，特别是马达加斯加同样形成了重要性的外交关系。

我们没有削弱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历史关系，也没有没有削弱我们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事业，我们要扩大我们在亚洲事务中的作用，从而促进我国的地区安全和稳定，增强亚洲人民和西方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在外交政策方面，国会各党派将寻找每一个机会提供积极的建议和合作。<sup>①</sup>这是整篇演讲中在关于外交政策的，比1962年的国情咨文少得多，而且对沙巴的提及也少得多。国情咨文演讲中通常是口头表达笼统的幸福和友好的一个机会，而不是沉迷于准确和公开地讲，友好国家比其他的更有价值，及其原因等这样的非外交习惯。然而，在这篇演讲中，菲律宾的外交政策的所有成分都有所减少。

<sup>①</sup> SEATO Record, Vol. 3, No. 2, April 1964, p. 10.

正如马卡帕加尔总统所说，不可避免的事实是，菲律宾属于亚洲，这迫使他要特别留意菲律宾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与泰国和日本，分别用于由于不同的原因，现在在菲律宾的亚洲最亲密伙伴的考虑之中。

## 二、马卡帕加尔时期的菲律宾独立自主对外经贸的迅速发展

从 60 年代之后，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菲律宾从其利益考虑，开始调整了对外经济关系。在继续发展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的同时，同样发展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并逐步推进发展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如前苏联、中国等）以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菲律宾通过加入一些地区性或国际性组织（如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以及通过与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建立联系，不断拓展对外经济关系空间，从而逐步形成了多元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格局。

马卡帕加尔上台后，随着菲美关系的密切度出现松动，菲日两国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涉及投资、贸易、贷款与援助、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除投资、贸易关系外，寻求从日本取得贷款和发展援助也是菲律宾发展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的重要领域之一。截至上世纪 70 年代初期，美国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来源。如 1970 年美国提供给菲律宾的援助额为 2100 万美元，占菲律宾获得的外国援助总额的 48%，居首位。而同年日本提供的援助额为 1900 万美元，占 44%，居第二位。但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出于其谋求扩大对受援国的贸易和投资的战略需要，日本开始加大了向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以东南亚地区为重点的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也急剧增加。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经常旅行在欧洲的菲律宾人，通常会去旅行的圣地——马德里和罗马的“拉丁”遗产，还不忘去布鲁塞尔访问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部，当然还有波恩市，毕竟六十年代的西德是菲律宾在欧洲最大的市场，可能产生更多实实在在的回报。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处于马卡帕加尔外交政策的次要地位，除非贸易条件更加优越，才会去深思熟虑进一步的关系。说白了，商业是外交政策重点。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与墨西哥谁传统的关系更为重要，当然，墨西哥也像菲律宾一样焦虑，不只是为了维持，而是为了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改善关系。自

1946年以来,菲律宾经常在联合国发起提案,而投票同意的国家往往是拉丁美洲国家。在1964年唯一的,也是永久的菲律宾运营的海外基地,在非洲尼日利亚的大使馆。其目的是为了在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建立新的任务。总的来说,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友谊不是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毕竟是次要的外交对象。非洲和拉丁美洲在马卡帕加尔的眼里,可以用来为菲律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其次,还可以在国际会议上为菲律宾攒足票数。

### 三、“马菲印多”<sup>①</sup>计划的提出

这是东南亚地区主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它的过程也比较曲折,但在促进东南亚合作方面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最初在1963年的4月召开的东南亚联盟三国外长会议上,菲律宾提出建立一个关于拥有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体,以图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因为没有东南亚大国印尼的参加,东南亚联盟很难在这一问题上有所建树,马卡帕加尔也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计,为了促进与印尼的良性发展关系,菲律宾率先提出来具有创造性的“马菲印多”计划。在“泛马来民族主义”口号下,希望与印尼团结起来,最好能组成一个共同体,于是马卡帕加尔向印尼总统苏加诺和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到马尼拉举行会谈。接下来,在1963年8月份,三国领导人经过会谈在马尼拉发表了成立“马非印尼联邦”的宣言,要旨在于加强三个马来民族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对内能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对外能抵御大国的介入及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由于三国各自的利害关系未能得到有效的均衡,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最终这个计划失败了,然而菲律宾尝试融入亚洲的决心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为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1963年到1965年间,ASA也需要与民族认同进行最初的拉力竞赛。1963年7月,尽管,印尼、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确定关系,但三个国家还是复苏了一个早期的构想就是菲律宾的卡洛斯·罗慕洛提出的建构一个泛马来联盟。建立在他们共同的马来人基础上的一个松散协商组织—马菲印多<sup>②</sup>,就像罗慕洛早期的泛马来联盟和泰国的佛教湄公河地区思想,这样的组织区别于

<sup>①</sup> Jose Ma Sison. Prospects for MAPHILINDO [J]. Eastern World, June 1964, p9

<sup>②</sup>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p24.

ASA（东南亚联盟）和之后的 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因为它根据种族和宗教组织发起的，而不是依据地理因素。

菲律宾在东南亚事务纠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参与程度，这种强烈的迹象源于马卡帕加尔上台后，与马老西亚和印尼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的频繁互动。<sup>①</sup>仅在1963年四月和8月初之间，三个国家成功地达成共识。根据马尼拉协定，马菲印多就这样诞生了，三个国家绑定在一起。但是马菲印多没有存活到1963年9月16日，这一天马来西亚联邦诞生。三个国家各有各的目标与打算，马来西亚似乎主要是专注于建立和维护一个可行的新联盟，但是她的努力与行动，使他的目标离他越来越远，而菲律宾和印尼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渴望在整个东南亚的决定性事件中，拥有更大发言权。简单地说，马来西亚似乎是专注于她的生存和她的繁荣的延续，但却忽视了她在国外的形象。印尼似乎不太关心他的内政，苏加诺更喜欢追求反殖民主义的冒险和高涨的革命热情，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关系本来就已经很紧张，还在马印对抗中温和地安抚双方，如此难处理的多边关系，虽有波动及摇摆，但菲律宾正在努力地使自己变得自信。

虽然，马菲印多理论上以假设的民族亲密为前提，现实的情况是成员国更多的出于政治动机，以及对即将成立的马来西亚联盟命运的兴趣，而不是他们在营造马来人的团结。事实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把马菲印多视为破坏提议马来西亚联盟的方法（通过取代后者），而马来西亚把马菲印多视为促进马来西亚联盟被其他人接受的方法。<sup>②</sup>在这个意义上，马菲印多在赞成马来西亚联盟的成立和不赞成马来西亚联盟的成立上进行转变。因此，当马来西亚联盟在马菲印多成立两个月后通过时，接下来的第二天，菲律宾就与马来西亚断交；印度尼西亚很快开始它的反对马来西亚联盟的马印对抗政策；马菲印多很快不复存在。<sup>③</sup>就像 ASA 一样，马菲印多发现对区域组织本身缺少强有力的承诺。这样的组织注定长久不了。

#### 四、沙巴主权争端及“马来联邦”<sup>④</sup>构想的提出

沙巴主权归属，一直以来是有争议的，它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在马来西亚联

<sup>①</sup> Michael Leifer .Anglo-American differences over Malaysia[N] .in *The World Today* , April 1964.

<sup>②</sup>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 23.

<sup>③</sup>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N.J. : Prentice-Hall , Chapter 1.

<sup>④</sup> G. F. 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istory, Government and Civilization)*[M]. Manila: Rex Book Store ,1963,p336.

邦成立之前，菲律宾就已经向英殖民当局提出了领土要求。菲律宾在此前对沙巴主权的争议虽有抗议但几乎没有进行过外交活动，直到英国将成立马来西亚联邦的活动提上日程，菲律宾才决定进行外交活动，这同时也给了马卡帕加尔一个难得的在国际舞台上表演的机会。马卡帕加尔总统在解决沙巴领土争端时又一次创造性的提出了成立“马来联邦”的构想。

1963年1月28日，在与英国的会谈中，菲律宾副总统和外交部长佩雷兹用反共产主义的逻辑来反对马来西亚对沙巴的企图。佩雷兹认为，马来西亚的内部弱点将会给在新加坡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个渠道，可能会影响婆罗洲，从而威胁菲律宾南部。<sup>①</sup>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是一种预防从新加坡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手段。佩雷兹认为，三个马来国家想要长久的和解，马来亚和菲律宾需要消除来自新加坡的中国威胁。这是第一次，马卡帕加尔的“马来联邦”的想法，囊括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联邦”的内容是成立一个由马来亚、新加坡、文莱、沙捞越、沙巴、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组成的共同体，在这个框架下，每个国家的内政自己负责，但在外交和安全防务上要联合起来，以便使沙巴争端带来的矛盾降到最低点，可见马卡帕加尔不仅要菲律宾参与到亚洲事务里来，还想要把话语权等握到手里。菲律宾促进扩大马来亚地区的联盟，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敌视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被放到次要位置，马卡帕加尔总统委托由菲律宾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包括穆斯林教徒和基督教徒)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对泛马来亚联盟的历史，经济，和马来语的国家的社会，进行的大规模研究，以论证其可行性。<sup>②</sup>马卡帕加尔总统的马来联邦不仅一种政策创新，也是根植于一个由菲律宾经济学家，企业家，政治家和教育家支持泛马来亚经济联盟的运动。1960年1月，阿拉内塔大学举行的菲律宾领导人和马来亚及印尼外交官的研讨会，探讨经济合作的途径。<sup>③</sup>菲律宾产业商会前总裁拉里·埃纳雷斯认为，尽管稳定的政治体制，由“新的声音和激进的中产阶级”撑起，但菲律宾的发展已经低于日本、印度、马来亚。在他看来“这可能是菲律宾商业需要被拯救，而不是由在国内外市场的菲律宾企业倡议的，要求保护其更加膨胀的自信和前瞻性。”<sup>④</sup>佩雷兹认为在世界市场上竞

<sup>①</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 pp. 176-177.

<sup>②</sup> Quijano . The Malay Confederation[M]. Manila: The Philippines Free Press, June 22, 1963, p.44.

<sup>③</sup> Salvador Araneta. An Economic Pan Malaya[N] . *Sunday Times Magazine* May 1, 1960, p. 10.

<sup>④</sup> Larry M, Henares, Jr. Our Economic Heritage[M]. A Public Service of the H.G. Henares and Sons, Inc., 1962, p. 12.

争的亚洲企业一直以来缺乏一个共同市场。<sup>①</sup>不久后，菲律宾、马来亚和印尼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沙巴主权问题，菲律宾表示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顺便能够解决统一的市场问题。然而在当时并没有多少国家响应这个提议，而且背后大国的干预因素也只多不少，最终这个计划夭折了。在整个过程中菲律宾十分重视美国的态度，然而几十年来的美菲特殊关系并没有带来菲律宾想要的结果，美国选择站在英国一边，因为美国不希望看到马卡帕加尔领导下的菲律宾脱离美国的控制，结果菲律宾却从此离亚洲越来越近了。

菲律宾一直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英国对此的回应是通过遵守英马防御条约来遏制东南亚的共产主义的扩张。这个条约承诺英国将保证马来亚的外部防御和其内部安全。英国强调维持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的承诺，意味着菲律宾的恐惧是有它自己的道理的：马来西亚将是一个脆弱的实体，可能无法独立应对其内部威胁。英国人并没有把马卡帕加尔的马来联邦作为一种马来西亚的替代品，但在马来西亚被创造出来之后，坚持某种类型的联邦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对于菲律宾的不满，英国作出一个举动，决定不管菲律宾的反对，推进包括沙巴在内的马来西亚的创建。马卡帕加尔想要联合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决定引发来自美国的消极回应，美国几乎没有注意过马来西亚计划。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只同意与菲律宾进行一月会议，现在英国认为美国欠他一个支持马来西亚的声明。对于菲律宾的惊恐，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2月15日宣布，他希望马来西亚能在当地的反对党面前坚持自己，因为“最好的希望莫过于世界最重要的地方是安全的。”<sup>②</sup>

## 五、马来西亚计划与菲印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深

英国拟将沙巴归入马来西亚的提案，重新勾起了作为菲律宾的公民—苏禄苏丹对沙巴的长期的主权意识。主权的本质在于苏禄苏丹与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1878年的租赁协议，并不是割让沙巴给大不列颠<sup>③</sup>。随着英国在沙巴统治的结束，所以，领土应该归还给苏丹的后嗣，因而应该被纳入菲律宾。这种说法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英国一直向苏丹继承人支付特许权使用费<sup>④</sup>。意识到，沙巴将被纳入新生的马来西亚国家，将会永远取消苏丹对其的主权，在1961年12月，苏丹人

<sup>①</sup> An Asian Common Market?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October 18, 1962, p. 55.

<sup>②</sup> Roger Hilsman, To Move a Nation: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 Kennedy[M]. New York: Dell Press, 1964, p. 385.

<sup>③</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 84

<sup>④</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 84.

和他们的支持者开始了一场公共运动以求重拾沙巴主权。苏丹继承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诉求与马卡帕加尔晋升为菲律宾总统的时间一致。1946年，时任外交部外交事务司司长的马卡帕加尔，在沙巴从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转让给英国政府后，他建议菲律宾提出领土主张<sup>①</sup>。另外，在1962年4月下旬，由苏丹的律师精心策划的新闻宣传，引领菲律宾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敦促马卡帕加尔承担起沙巴主权的重任<sup>②</sup>。把描写沙巴问题的新闻作为菲律宾民族主义的试金石，马卡帕加尔也发现抓住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巩固自己国内地位。

尽管民族主义的反美政策能保护马卡帕加尔在国内舞台上的政治利益，但是潜在成本是丢失美国在安全领域的支持，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当时西伊里安冲突正在升温。一些菲律宾精英部分害怕印度尼西亚的扩张主义，特别是在菲律宾的穆斯林地区，棉兰老岛。另外一些菲律宾的领袖害怕如果军事冲突升级，苏加诺会要求苏联军队直接的支持。作为美国庞大的军事基地，菲律宾领导担心成为苏联侵略目标，不论是通过直接外部袭击还是通过间接内部颠覆。总之，因为印度尼西亚诉诸武力及苏联潜在的区域干预，伊里安纠纷在马尼拉引发的安全问题持续升温。正如菲律宾领导人担心的，在伊里安苏联的出现可能针对菲律宾，苏加诺害怕在菲律宾的美国军事基地可能被用来帮助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人的脑海中，1958年美国如何利用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作为轰炸PRRI叛军的发射台。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再次发生，1962年初苏加诺派夫人为他的个人特使去菲律宾作，向菲律宾保证它的军事行动集中在伊里安。作为承诺的回报，菲律宾将不允许美国的军事基地用来支持荷兰，菲律宾外交部长佩雷兹受到苏加诺的承诺：在与荷兰的争端中不会涉及第三者<sup>③</sup>。总之，意识到他们的外部关系引发了他们邻国的安全恐惧，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在区域层面达成了协议，以控制超级大国的行动，而且他们承诺不会利用其他的东南亚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领导人寻求保护本国手段的意识增强，又避免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担忧，使这两个区域领导人得以认真改善他们的安全问题。

苏加诺的保证，加上联合国的调解讨论，印尼和荷兰之间加快了解除伊里安争端的进程，这也导致马卡帕加尔开始把眼光抛向沙巴主权。1962年6月，马

<sup>①</sup> Brackman, Southeast Asia's Second Front[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 167.

<sup>②</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pp. 107-108.

<sup>③</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pp. 157-159.

卡帕加尔宣告菲律宾对沙巴有历史和合法的权利保护其安全；它的目的是：追求和平主权，并要求与英国进行谈话讨论沙巴主权<sup>①</sup>。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宣言是在面对美国明确的反对情况下，这个国家第一次自主采取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两天后，马卡帕加尔提出了一个替代马来西亚的东西——马来联邦，联邦内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婆罗洲地区。马卡帕加尔描述称其为马来联邦，“我们，马来人民必须努力寻找新的、更广泛基础的和有效的合作和统一。我不相信我们应该把这个重要的任务留给即将离任的殖民地的权力。这是一个我们马来人民必须自己做的任务。”<sup>②</sup>

## 六、区域安全的加固

区域安全的加固是菲律宾政府及马卡帕加尔外交努力的结果。首先是区域安全和友好关系。区域安全的紧迫性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东南亚是众所周知的，菲律宾强调对于该地区的责任永远是国家的责任。正如一位菲律宾政治家所说，虽然英国可能希望扮演一个小角色。在东南亚“优雅的退出”，但是菲律宾在东南亚走不掉的<sup>③</sup>。菲律宾也拒绝了英国对马来西亚新政府的责任代表团，马卡帕加尔总统宣布，“我们对沙巴的领土主张不能小于马来亚，我们不仅有优越的司法和历史性权利的基础，而且沙巴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马来亚不可能保证沙巴岛的自由世界长期的安全”。<sup>④</sup>菲律宾的主张不仅源于合法性和安全性的考虑，也源于民族团结的考虑，一名发言人说：“在沙巴岛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更直接，因为它离我们更近；北婆罗洲的人民来自同一种族；多年的政治孤立和敌对的宣传，加深了我们两地人民之间的隔阂。”<sup>⑤</sup>在马来西亚联邦建立之前，整个密集外交的过程中，佩雷兹始终强调需要包括菲律宾、印尼和马来亚之间的三方的协调，寻求一个公正和友好的解决方案，建立在三方共同关心的“安全、自由和幸福”。<sup>⑥</sup>本着友好协商的宗旨，1963年4月，在马尼拉的三方部长级会议，佩雷兹煞费苦心地促进三个国家之间的联盟。随着马来西亚问题升级为东南亚危机，并希望说服印度尼西亚加入 ASA 希望越来越渺茫，作为一个可能的

<sup>①</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p. 60.

<sup>②</sup> Leifer.,The Philippine Claim to Sabah[J]. Sage Publications, p. 29.

<sup>③</sup> TV speech on March 30, 1963 by Representative Jovito R. Salonga,Chairman of the Legal Committee, Philippine panel at the London Talks on the Borneo Claim; full text printed in the *Sunday, Chronicle*, Manila, March 31, 1963, p. 15.

<sup>④</sup> State of the Nation Message, January 28 ,1963; also President Macapagal’s statement on 5 December 1963, *The Malay Mail*, December 6, 1963.

<sup>⑤</sup> Salonga. *op. cit.*, p. 15.

<sup>⑥</sup> Salonga. *op. cit.*, p. 15.

未来经济联盟的核心—ASA，菲律宾对其越来越失望。<sup>①</sup>佩雷兹指出，必须承认ASA的局限性，发展与那些目前出于政治原因，未能加入ASA的亚洲国家“尽可能充分地”的双边关系。菲律宾在1963年外交思想的重点是印度尼西亚。

其次是菲律宾与印尼的协议。马来西亚争议使东南亚联盟传统路线受到了挑战，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使东南亚反共产主义同盟面临着巨大的分裂；菲律宾和英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盟友，马卡帕加尔上台后却成为了相互敌视的双方。但这种局面的发展导致该地区最重要的力量的调整，那就是菲印协议。对比以前的菲律宾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政治态度和政策，两个国家有了鲜明的新的变化。在签署移民协议后，菲律宾政府启动了对印尼移民的渗透带来的伊斯兰，共产主义和非法贸易的抓捕工作。印尼共产党不断增长的力量，加上印尼政府的不结盟政策及其与苏联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引起了菲律宾政府的极度不安。马卡帕加尔上台前，菲印关系一直处于一个冰点。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和外交部长佩雷兹开始了转向菲律宾亚洲政策后，开始了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更亲密关系的第一步。在西伊里安问题纠纷中，菲律宾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幕后支持印尼。<sup>②</sup>

除了种族亲和力，安全被认为是菲律宾对印尼政策后续改观和地区形势评估逆转的理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仍然存在于菲律宾亚洲政策，但是，正如佩雷兹所说，“过去的安全问题曾经是印度尼西亚。现在怀疑的空气消失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收获，如果印度尼西亚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保持这一地区的人不被外人所主导，包括共产党<sup>③</sup>。”许多菲律宾政客赞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指出，遏制共产主义的印度尼西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友谊和外交的支持此以促进印尼民主的力量。甚至众议院议长主张与印尼签署国防防卫协定。<sup>④</sup>印尼和菲律宾领导人都表示“两个国家有着完全一致的理解和和谐的目标，真正的基础就是马来人民之间在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sup>⑤</sup>，苏加诺总统访问马尼拉的前夕，在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马卡帕加尔总统就非洲的复兴，重申他的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承诺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样。但他指出，印度尼西亚解释其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称菲律宾印尼磋商为“无情的方式促进生长和维持马菲印多作为和平建设性的概念，以保证我们地区的自由和人民的福利，其结果是全人类的福

<sup>①</sup>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R]. October 4, 1962, p. 4.

<sup>②</sup> 1963年5月菲外交官员同印尼外交人员在菲律宾外交部举行会谈。

<sup>③</sup> 佩雷兹在1963年5月12日接受印尼记者采访时表达此观点。

<sup>④</sup>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 Ganis Harsono 于1963年3月1日公开宣布印尼坚定自己的不结盟立场。

<sup>⑤</sup> 马卡帕加尔总统和苏加诺总统于1963年5月22日发表联合声明。

祉”。<sup>①</sup>这一切证明了菲律宾大胆的政策，寻求新朋友—印度尼西亚，凡涉及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化敌为友是在正常不过的了。

### 第三节 外交转向的限度

#### 一、菲美“特殊关系”的回潮——马卡帕加尔思想妥协的影响

马卡帕加尔所做出的外交调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有限的外交调整”，菲律宾官方也否认外交改革是“远离美国”，而只是想要通过发展民族主义外交改变其国际形象，在马卡帕加尔执政期间，始终无法摆脱美国的阴影，在美国的压力下，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名义，被迫卷入到越南战争中去。近期，由美国背后操纵，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却严重违反国际法的闹剧，严重破坏了亚太地区的稳定，也使菲律宾对外关系陷入困境，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使自马卡帕加尔总统开始建立的菲律宾对外关系的发展，遭受重创。虽然突破美菲“特殊关系”、发展民族主义外交和建立更广泛的有利于自身安全的机制，成为了菲律宾外交方向的主旋律，但这条路菲律宾还要继续往前走。

马卡帕加尔总统经常在自己的演讲中谈到外交政策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国内的支持是开展任何成功的外交政策，所具备的先决条件。旧的政治精英，拥有土地的阶级一直都存在，虽然下届总统选举是到1965年11月才开始，国内政治家的讨价还价，幕后操纵已经明显正在进行，因为总统选举是一种昂贵的交易。总统马卡帕加尔希望寻求连任。他执政的自由党在他执政后期处于混乱状态，而这部分原因是他自己向政治对手靠拢妥协的结果。这也反映了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马卡帕加尔执政的三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个外交部长。这并不是说外交部长职位在菲律宾政府，通常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份量，马卡帕加尔总统对这一规则没有任何真正的例外，主要责任是他自己的外交部长没有真正贯彻他的外交政策。马卡帕加尔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被证明是一个帮助或阻碍在他寻求另一个总统任期仍然是一个非常公开的问题，结果是肯定的。如果过去的选举中提供了任何有用的先例，那么外交政策的事情最有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又或者最多只是边缘性问题。

<sup>①</sup> 1964年1月10日马卡帕加尔在马尼拉扶轮社发表演讲。

在可预见的未来，菲律宾外交政策将严重依赖与美国的联系，但菲律宾寻求亚洲身份认同这件事上，对美国存在强烈不满，认为只有美国退出东南亚，菲律宾的邻居才会承认他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如果美国在东南亚处于衰弱态势，那么菲律宾将有可能支持不结盟运动，或者寻求新的力量比如中国或日本的庇护，当然这种剧烈的变化在当前不会出现。<sup>①</sup>

马卡帕加尔为菲律宾的前景打造出了一个新的模式。把以前美国为主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亚洲为主民族主义；以及原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已进入一个新的亚洲轨道。并表明在新的轨道上，菲律宾与美国没有发生太大的碰撞。对于后者，在已故总统肯尼迪和现任总统约翰逊，佯装与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不结盟国家<sup>②</sup>的友好关系，也没有过多评论菲律宾声称的沙巴岛归属问题。因此菲律宾的亚洲主义和美国关系之间似乎有微妙的平衡。

## 二、文莱起义和马印对抗的被动卷入——菲印关系持续波动

菲律宾对文莱起义的反应是复杂的，马卡帕加尔追求沙巴主权过程的一些外交政策，例如反对共产主义，促进亚洲认同，并针对文莱起义与印尼形成更近的关系的政策。菲律宾的面对的情况也是复杂的，阿扎哈里的存在，以及北加里曼丹省要求与马尼拉脱离关系。阿扎哈里寻求佩雷兹对于北加里曼丹省的认同，认为，对在婆罗洲北海岸的独立国家的支持可以确保邻里的友好，但是他拒绝提交一个解决沙巴争端的方案<sup>③</sup>。支持哈里的解放运动将增强菲律宾作为支持反殖民国家的立场，沙巴可能并入马来西亚，但是菲律宾无法承诺沙巴主权的解决。

有一些国内的菲律宾人支持阿扎哈里。政治人物奥斯米纳，众议院的副议长，和马卡帕加尔总统的法律顾问都公开支持起义。菲律宾外交部部长助理洛佩兹也倾向这一立场。此外，随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语言战争的加热，结识阿查哈里会帮助马卡帕加尔改善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这是马卡帕加尔和他的支持者视为必要的，用来改变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国前哨的国家身份。但是，在菲律宾更多的保守声音，包括副总统，外交部长佩雷兹，参议员苏牧龙，参议院外交关

<sup>①</sup> Peter Ly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Philippin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J]. The World Today, Vol. 20, No. 12. Dec. 1964, pp. 533-541.

<sup>②</sup> Mc George Bundy. Friends and Allies[J].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62.

<sup>③</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 pp. 167-168.

系委员会的主席，更重视菲律宾外交政策中的反共产主义的成分。<sup>①</sup>对他们来说，阿查哈里的左翼支持者如在新加坡的社会主义阵线，和印度尼西亚的 PKI，会在菲律宾增加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一群体还反对与印度尼西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相反，它认为菲律宾应该集中精力改善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强 ASA 的团结与建设，而不是靠近印度尼西亚，许多保守派人士涉嫌在棉兰老岛支持穆斯林分裂分子。总之，马卡帕加尔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是支持第三世界，反共产主义，政策倾向阿扎哈里。但是，叛乱被镇压的速度，导致马卡帕加尔得出这样的结论：支持阿扎哈里的成本超过了任何可能的好处。此外，马卡帕加尔想要确保得到保守派对于沙巴主权的支持，保守派很多不支持。<sup>②</sup>1962 年 12 月 18 日，马卡帕加尔宣布，对于阿扎哈里的要求，他“不会付诸行动”。几天后，阿查哈里离开菲律宾流亡印度尼西亚。<sup>③</sup>

菲律宾拒绝支持阿扎哈里并不暗示它支持马来西亚计划。1963 年 1 月 28 日，在印度尼西亚采取马印对抗之后，马卡帕加尔立国情咨文中宣布，起诉沙巴主权是他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sup>④</sup>。在他的讲话中，马卡帕加尔将菲律宾外交政策的重心从沙巴主权的抗辩转移到反对马来西亚计划。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攻击马来西亚计划，“不按照自决原则……而是只基于虚假安全的一种殖民主义的延续”。此外，马卡帕加尔明确把菲律宾政策与印尼利益联系起来，把马来西亚描述成一种新的殖民势力，认为印度尼西亚不应该期待接受马来西亚在婆罗洲的领土权力。<sup>⑤</sup>菲律宾在处理马印对抗时，一直声称菲律宾的利益与他们的利益完全相同。马印对抗的各个方面已经明确表示，这种说法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虽然印尼“游说”团在马来西亚之前，早已在马尼拉建立起来了，但很明显，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菲律宾倾向于后者。事实上，马卡帕加尔总统在 1964 年 5 月，与这两国建立了领事馆的外交关系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说了很多<sup>⑥</sup>。但政治上成熟的菲律宾意识到，与巨大的邻国印尼有共存必要性，并试图了解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可能会发生什么。可以理解的是，马卡帕加尔只有尽可能地推

<sup>①</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 130.

<sup>②</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 130.

<sup>③</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 pp. 172-173.

<sup>④</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 p. 176.

<sup>⑤</sup> Leifer, The Philippine Claim to Sabah[J]. Sage Publications, p. 42.

<sup>⑥</sup>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R].21 May 1964, p. 372.

迟公开反对印度尼西亚的最终决定，两国如果发生冲突，菲律宾不会得到什么便宜。同时，在谦虚务实合作方面，与马菲印多相比，ASA 更可能有立竿见影的方案，况且随着沙巴争端引起的菲律宾与马来西亚的矛盾越来越有扩大化的趋势，马菲印多实际已支离破碎。

### 三、菲马关系的频繁波动——“沙巴争端”悬而未决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反对马来西亚的成本渐渐增加，这两个国家努力去减少自己的损失，但是他们选择直接相反的政策。苏加诺试图说服马卡帕加尔激化与马来西亚的矛盾，但马卡帕加尔却接近马来西亚领袖，试图解决冲突。

苏加诺到达马尼拉与马卡帕加尔会晤的同时，美国约翰逊总统授权，最后一次努力调解马印对抗。苏加诺此行有两个目标：在马印对抗中得到菲律宾的充分支持和创造一个新的菲律宾无税港代替新加坡，作为印度尼西亚产品的出口地。作为回报，印度尼西亚提供以下条件：不再在东南亚扩张印尼势力；承诺在马印抗争中不会追求共产主义的帮助；全力支持菲律宾的沙巴主权。<sup>①</sup>

印度尼西亚发起的峰会，目的是巩固菲印共同策略，反对马来西亚。<sup>②</sup>一些菲律宾人愿意冒着与马来西亚军事冲突的危险，但自由港的想法被否决了，因为它将会激化在菲律宾南部已经很严重的走私问题，代价太大。两个国家呼吁包含马菲印多精神在内的价值观，与东姑阿都拉曼首脑进行会谈时，强调马菲印多的大门应该一直为马来西亚的回归敞开。<sup>③</sup>有趣的是，联合声明称，要将马菲印多变成现实，而且组织要扩大到包括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这标志着印度尼西亚首次考虑加入一个东南亚地区的组织。<sup>④</sup>

马卡帕加尔送试探者去泰国、英国和美国努力让他们劝服东姑阿都拉曼与其在没有前提条件下进行见面。在恢复马来西亚菲律宾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下，东姑阿都拉曼此前就已经开会讨论沙巴主权。苏加诺在马尼拉试图垄断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合作的全部事项，东姑阿都拉曼回应说他愿意约见马卡帕加尔任何时候任何地点。<sup>⑤</sup>表明东姑阿都拉曼有了进一步的，与菲律宾的和解倾向。相对于印度尼西亚对马来西亚的看法，菲律宾被马来西亚认为是机会主义者而不是扩张主义

<sup>①</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Australian University. pp. 246-247

<sup>②</sup> The New York Times[N]. January 8,1964

<sup>③</sup> The New York Times[N].January 10,1964.

<sup>④</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Australian University. p. 249.

<sup>⑤</sup> Ott.The Sources and Content of Malaysi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D]. Johns HopkinsUniversity.p. 288.

者。此外，马来西亚领导人认为，美国将限制菲律宾采取任何严重损害马来西亚利益的行动。因此，马来西亚对马卡帕加尔比苏加诺显得更加放心。

1964年1月21日，柬埔寨总理西哈努克王子低调抵达吉隆坡，声称他已经应马卡帕加尔邀请参加与东姑阿都拉曼的讨论关于沙巴主权的会议。东姑阿都拉曼后来又来到金边谈判，金边谈判最终从2月10号到12号顺利的举行，东姑阿都拉曼希望解决沙巴争端并重建与菲律宾的外交关系。东姑阿都拉曼知道马卡帕加尔想要在峰会中扮演调解的角色，这将会是由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纳·柯曼<sup>①</sup>努力的一次成功的调节峰会。马来西亚领导人意识到菲律宾国内的越来越多的保守派反对马卡帕加尔的印度尼西亚战略，希望马来西亚帮助马尼拉控制走私猖獗的沙巴，据称马卡帕加尔需要克服国内的反对“亲印度尼西亚的游说团体”来改善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然而在金边，对于如何解决沙巴争端双方僵持不下。菲律宾坚持向国际法庭递送申请，但东姑阿都拉曼在紧张的国内约束下拒绝了同样的做法。唐纳德·斯蒂芬斯，沙巴首席部长陪同东姑到柬埔寨，并宣布如果东姑考虑递交菲律宾声明到国际法院，沙巴将脱离马来西亚。<sup>②</sup>马卡帕加尔不愿意与马来西亚建交，直到有一个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三方解决方法，所以建立领事关系的初步协议破裂。在这一点上，马卡帕加尔明确表示不愿意牺牲与苏加诺的关系，来改善与马来西亚的关系。

沙巴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区域争端问题。菲律宾声称，所涉及的法律论据表明，他们已经证实很大程度上，原英属北婆罗洲情况确实是复杂的。但英国和马来西亚政府不愿意承认菲律宾的主张是合理的，这无疑是基于政治考虑。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并不少见，并承认这种说法作为一个开放的问题，可能会开启政治的潘多拉之盒，地区不稳定的因素大大的增加了。可以想象的是，文莱的苏丹可以向沙巴提出领土要求。当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印度尼西亚也可能要求比她现在拥有的更多加里曼丹领土。这甚至可能会导致印尼对棉兰老岛提出领土要求，这是菲律宾第二大岛屿，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位于菲律宾群岛最南端的岛屿之一。事实上，印尼政府新闻机构安塔拉，已经报道了，菲律宾“自由战士”，援助了北加里曼丹（沙巴）的“民族解放的斗争”。还有菲律宾官方不

<sup>①</sup> 金边会谈之际，上述三方部长级会议同时在曼谷召开。

<sup>②</sup> Abell.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D]. Australian University. p. 262

愿意承认，但棉兰老岛的摩洛人分离运动的确不是存在了一两天而已。关于沙巴的详细资料 and 文件，菲律宾政府对外界公布甚少，很多细节还有待挖掘。在政府要员公共演讲的主题中，重点提到安全，自决<sup>①</sup>和合法权利，表达又有所不同。仍然很难知道菲律宾在这个问题上的终极期望到底是什么。是不是真的认为他们的国家最终会拥有沙巴？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硬撑？第二个问题是可能会比第一个的更贴近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马卡帕加尔总统自己的个人承诺的声明。

---

<sup>①</sup> 萨尔瓦多·洛佩兹在 1963 年 10 月 8 日,联合国大会之前发表演讲。

### 第三章 外交转向的历史动因

#### 第一节 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及推动

“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比较抽象，普遍认为是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运动，在近代饱受西方列强残酷殖民的亚非拉地区发展起来。菲律宾的民族主义运动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它始终以争取民族独立为主线，反抗西班牙、美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最终在二战后迫使美国当局在其限定的主权范围内独立。20世纪60年代菲律宾民族主义运动始终是以反美为主线展开的，它在经济和外交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

##### 一、民族主义运动下凸显的美菲矛盾

首先，美国国会拒绝了菲律宾的战争赔偿法案，这引起菲律宾的愤怒<sup>①</sup>。也是对美政策调整的导火线，在与美国的其他摩擦中，对烟草进口、糖出口和对待老挝的政策上，一个被描绘成“反美”政策的外交政策，将促进菲律宾民族主义意识的崛起，并为马卡帕加尔争取到国内政治利益。其次，马卡帕加尔曾经抨击他的前任腐败，但是很快发现他内阁的一些成员卷入腐败丑闻。马卡帕加尔希望索要沙巴主权，能够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丑闻中转移开。正如米迦勒利夫(Michael Leifer)观察到的那样，“马卡帕加尔似乎决定选择一场国际斗争，这似乎是菲律宾政治内部需求。”<sup>②</sup>总之，加强他国内政治支持的希望，导致马卡帕加尔坚决支持一项，明确与邻国利益相关的政策。

从菲独立以来美菲之间就已经积累的很多矛盾，而到马卡帕加尔执政期间许多问题凸显出来了，首先是经贸问题，这其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经济法案——“贝尔贸易法案”<sup>③</sup>，它在菲律宾独立当天和“美菲总关系条约”同时签订，它规定美菲之间为“自由贸易”，使菲律宾继续成为美国的原料进口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另外还有规定写入菲律宾宪法的，使美国公民和公司享有同菲律宾人一样的“同等权利”条款，就是这样的经贸协定致使菲律宾始终带有一种“半殖民主义”的色彩。而到马卡帕加尔时代，不断有民众游行示威，甚至与警察发生武力冲突来表达撤销该法案的意愿。其次为美国资本输出问题，以美国联合水果公司

<sup>①</sup> Lela Gamer Noble . Philippine Policy Toward Sabah : A Claim to Independence[M].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pp. 51-61.

<sup>②</sup> Michael Leifer. The Philippine Claim to Sabah. [J].Hull: University of Hull Press, 1968, p. 26.

<sup>③</sup>金应熙. 菲律宾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年, 第638页

为例，在菲律宾大肆圈地 7000 到 8000 公顷，这件事被揭露以后，在菲律宾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蕉争论”事件<sup>①</sup>，后在马卡帕加尔示意下，将美国联合水果公司的租地申请搁置下来。再者，就是战争损失赔偿问题，二战以后，菲律宾损失惨重，美国通过《复兴法案》对菲进行援助，然而并不那么简单，《复兴法案》是同“贝尔贸易法案”捆绑在一起，美国尽可能的削减了赔偿金额，到了马卡帕加尔总统上台以后，由于经贸摩擦，美国否决了对菲律宾战争损失赔偿的两个提案，决定停止向菲律宾赔偿，从而直接导致马卡帕加尔取消了对美国的访问。最后，美军事基地问题。美国与刚刚独立的菲律宾签订了《美菲军事基地协定》和《美国对菲律宾军事援助协定》两个军事协定，其中美国军事基地面积占到菲律宾总面积的 1/7，美军在基地享有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各种特权，不断有美军枪杀平民的暴行发生，在马卡帕加尔时代，大规模的游行罢工进行抗议，要求美军撤出菲律宾，反美情绪不断高涨，马卡帕加尔明显利用了这种民族情绪。

## 二、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发展

马卡帕加尔执政之初，直接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菲律宾“可能采取主动”调整美菲贸易总协定。美菲矛盾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美菲贸易关系的不平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贸易协定就是《美菲贸易协定》，又被称为贝尔贸易法案，这是是在菲律宾独立的那一天，由罗哈斯总统和美国首任驻菲大使麦克纳特签订的，是一个很不平等的条约，条约在表面上披着“自由，平等”的外衣承认菲律宾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但在实质上是把菲律宾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国，条约里甚至连内容都极其苛刻，比如“菲律宾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美国将全权代表菲方利益”和“菲律宾政府将承担美国殖民政府时期的全部债务和义务”。其中规定，菲在独立以后要继续维持美国殖民时代的“自由”贸易制度，美国人享有开发菲律宾国内资源的“同等权利”，与菲律宾公民并无差异。

美菲贸易协定一开始打着“自由”的旗帜，从菲律宾独立初期的 1946—1949 年间，菲美贸易总额 22.6 亿美元，菲方逆差 11.07 亿美元。菲律宾的新兴资产阶级在菲律宾与美国签订此贸易后，受到的损害是最大的，因而从开始就坚决反对菲律宾政府在此贸易中签字，此后菲律宾国会中的一些议员也开始反对这项贸

<sup>①</sup> Martin Meadow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hilippine-American Relations: A Case Study in Emergent Nationalism[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p309.

易协定,因为《美菲贸易协定》从头到尾都严重的侵犯了菲律宾的国家主权。1954年菲律宾政府开始派代表团到美国争取修改《美菲贸易协定》的谈判。1955年初菲美双方达成了《劳雷尔—兰利协定》,用以替代之前的《美菲贸易协定》。然而《劳雷尔—兰利协定》并不比之前的贸易协定好多少,只是做了做表面功夫而已。《劳雷尔—兰利协定》中,美国仍然享有一些特权,例如在菲律宾国土上开展采矿和修建公共设施规划项目中,美国和菲律宾一样拥有“同等”权利,甚至把殖民时代的“利益均沾”等范围最大化,美帝国主义的势力渗透到菲律宾的方方面面。在同与美国的经贸发展历程上来看,《劳雷尔—兰利协定》依然是一个极不平等的贸易条约,菲律宾各个阶层的人民日益贫困,美国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悄无声息又不间断地吸食着菲律宾人民的财富。

马卡帕加尔执政之初,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不平等仍然存在,这其中以美国为主,西方国家尽其所能在菲律宾国土上倾销商品,并且进行资本输出,而菲在美国的商品出口率在逐年下降。在三个方面表现尤甚:首先,限制菲律宾的服装进口;对这个项目的其它一些商品则实行禁止输入。其次,拒艳让菲律宾航空公司根据对等的权利,在美国西海岸取得较多的飞行权利。最后,对菲律宾椰子油的进口硬性规定了“限额”,对“限额”以外输入的椰子油每磅征收“附加税”一分美元。美帝国主义推出贸易政策,目的在于逐步扩大美菲贸易差,使每年的美国出口率递增,而菲律宾每年的出口率不断下降,同时也使战后菲律宾的民族经济和工业发展遭受重创。时任菲律宾商会主席亚西加指出,美国执行的这些歧视政策会使菲律宾企业遭受重大打击,在马卡帕加尔执政的第三年,菲律宾包括椰子油生产商协会的各种商会团体,强烈谴责美国限制措施,要求政府同美国进行谈判以取消附加税在内的各种不平等税目。群众的不满犹如坚冰下的河水缓缓流动,抗议美国歧视政策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对《劳雷尔—兰利协定》修改已是迫在眉睫,菲律宾政府在马卡帕加尔的领导下,终于同意做出对菲律宾人民负责且有利的事情。

美国的触角已经深入到菲律宾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菲律宾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榨。菲律宾社会各个阶层都普遍对美国持有敌视态度,尤其是处于中下层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普遍比较艰辛。群众的呼声不断高涨,迫使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人民免受美国资本的伤害,特别是商业领域更需要菲律宾政府的

果断政策，提高关税，扩大出口，改变美菲贸易的不平等。深深植根于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多方面的美菲之间的矛盾和斗争，随着菲律宾人民的日益觉醒和美国在亚洲力量的日益削弱，进一步发展和尖锐起来，菲律宾对美国的离心倾向也将进一步增强。<sup>①</sup>

### 三、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发展

外交领域的民族主义发展也在蓬勃发展。比起加西亚“菲人第一”的口号在经济领域的民族主义表现，马卡帕加尔更多的是在外交领域扛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就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着重谈到对外交变革的想法，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改变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中的形象，不再像以前那样对美国卑躬屈膝，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话语权。菲律宾独立后的社会微妙且自然地接受了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宗教方面以基督教占据主要地位，伊斯兰教逐渐被边缘化，英语为官方语言，菲律宾政府的这一决定，使菲律宾和大多数从西方列强殖民下独立的国家不同。在这样如此特别的前提下，菲律宾与其它新兴亚洲民族国家之间产生了心理上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因此，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菲律宾必须迈出重回亚洲的脚步，逐渐摆脱美国的阴影。但是，菲律宾社会各阶层对马卡帕加尔的民族主义外交有着不同的理解，菲律宾官方的解释是：如果菲律宾想要在亚洲的国际舞台上成为领袖，就要首先学会如何与亚洲国家相处。<sup>②</sup>因为“很少有国家真正认为菲律宾是一个外交独立的国家，在联合国菲律宾始终以美国马首是瞻。

## 第二节 冷战背景下菲律宾安全困境的考虑

### 一、越战的介入及对菲美同盟的影响

越南战争对东南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二战之后，美国投入兵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这场战争处于冷战的背景下，同时是对菲美同盟关系的一次严峻考验。二战后，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纵然法国携重兵重返印度支那半岛，依然阻挡不了越共南下统一的势头，尤其在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在越南基本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挽救法国的危局，更为了阻止“红色亚洲的威胁”<sup>③</sup>，美国国会进行了激烈争论，就直接军事干预还是幕后支持产生了分歧，但目的一致，都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迫于当前印度支那岌岌

<sup>①</sup> 陈赞威.美菲经济矛盾的新发展[J].世界知识, 1964(12).

<sup>②</sup> 金应熙.菲律宾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第638页

<sup>③</sup> 国务卿杜勒斯1954年3月29日在纽约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的题为“红色亚洲的威胁”的演讲，是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签订序幕。

可危的形势，最终国会形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美国不单独介入印度支那事务，必须进行“联合干涉”，它意味着要把菲律宾、韩国和英联邦亚洲成员等在东方的盟国都拖入这场战争中。随着美国“联合干涉”方案的抛出，《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被提上日程，并最终敲定，菲律宾与英、美、法、澳、新、泰、巴八国于1954年9月8日正式签订该条约，它标志着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而它对于菲律宾的意义在于菲美同盟的进一步强化。事物总是两面性，强化同盟的重力之下必定显现出裂痕，哪怕是微小的。由于同盟条约的掣肘，菲律宾被绑到美国的战车上，被迫卷入越战。这无疑给菲律宾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增加了菲律宾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即使签订了条约，也不代表菲律宾就充分认同这份条约内容，到后来出兵越南，马卡帕加尔依然很谨慎的进行调度，分别于1964年7月和1965年3月派遣了经济技术小组和医疗小组约100多人前往越南战场。随着越战的扩大，美国要求马卡帕加尔派遣更多的军队，而这一要求被菲律宾参议院否决。

## 二、军事安全的考量

菲律宾自身安全的综合考量也是菲外交转向的重要动因之一。菲律宾外交转向的关键时期正处于冷战大的背景下。二战结束后的初期，菲律宾民众鉴于遭受过日本的残酷殖民统治，普遍认为日本始终为菲律宾的潜在威胁，在战后对日媾和过程中，一贯坚持严惩日本，但随着东亚局势的变化，美国由压制日本到扶植日本，这一政策的改变，激起了菲律宾强烈的反对，由于美国的压力和斡旋，最终菲律宾妥协，和日本由敌对走向和解，甚至是潜在盟友的道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主义在亚洲的迅速发展使刚独立的菲律宾政府感受到巨大的威胁，菲律宾立刻采取敌视中国的方针，这美国的冷战政策不谋而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菲律宾不仅依靠和美国签订的各种军事同盟协定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且还和除美国外的亚洲其他自由国家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合作。菲律宾主动提出成立的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太平洋公约组织”<sup>①</sup>构想被美国所接受，以及在马尼拉签署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同时，由于菲律宾东道主的坚持，与会各国同时签署了由菲律宾单独起草的“太平洋宪章”，在更多的时候，菲律宾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表现出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一面。马卡帕加尔鉴于与美国陷入各种经济纠纷中，同时为了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自身的经济

<sup>①</sup>于群.太平洋公约组织的策划与破产[J].长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第49页。

安全，积极的与东南亚各国和大洋洲各国建立更多联系，加强与日本、西欧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财政联系，尤其是日菲关系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两国贸易额度迅速增长，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以上这些情况都说明菲律宾在追随美国的政策上有所放松<sup>①</sup>。但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马卡帕加尔这样说到：

在冷战的背景下，菲律宾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关于我们的不妥协的立场上已经有一些问题浮现出来，但我们不能屈服于无处不在的诱惑，来放松对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的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因为缺乏警惕而被颠覆和失去，尽管我们努力认真地发展经济，但这样的理想是徒劳的。

政府在打击政府和社会的重要部门的共产主义的渗透方面，保持了不懈的警惕性。在民主的庇护下，通过我们随后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成功计划，共产主义敌人被迫撤退和失败。去年，菲律宾警察展开了激烈的和平和秩序的运动，强调与其他情报和警察机构在协调情报行动，导致三中共高层领导人去年七月在奎松市被围捕，另外本杰明·库纳南别名指挥官希松在邦板牙的阿拉亚特投降。去年五月，武装部队的情报局负责逮捕的中国商报十二名工作人员，被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关。激烈和彻底的情报活动也带来了政治传输第 17 号文件的发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性文件。<sup>②</sup>

在远东，菲律宾的亚洲主义仍然是从根本上以保障安全为主，但恐惧的对象是共产主义中国，而不是日本。菲律宾投票赞成联合国决议认定共产主义中国是在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并派菲律宾队伍与联合国部队一起作战。因共同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菲律宾还于 1951 年签署了对日和平条约，以巩固远东的安全。自那时以来，与日本的贸易和外交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开放繁荣的另一条途径”，成为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宗旨。1960 年，菲律宾商务部与日本签署了友

<sup>①</sup> 金应熙. 菲律宾史[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第 731 页。

<sup>②</sup> State of the Nation Message of President Macapagal, January 26, 1963

好通商的条约。马卡帕加尔当选总统后，宣布他在 1963 年前，打算扩大“清晰而稳定的基础”上的这些关系。<sup>①</sup>虽然对日和约被菲律宾参议院拖了很久才批准，是因为对日本持续的恐惧，马卡帕加尔总统重申了他的决心，履行他与日本之间的关系更牢固的决心，“在最早的时间可能弥补过去失去的时间”。而且，宣布日本和菲律宾现在都是“自由事业的盟友”，并加快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会在一个更好的位置来满足各自的职责，努力保护权利和自由世界的基本自由和提高所有人类的繁荣。”<sup>②</sup>

在东南亚，菲律宾亚洲主义既以安全为导向又带有友好性质。共产党力量在越南不断增长的阴影，菲律宾希望继续在东南亚保留西方列强的“存在”，就像雷克托曾要求其在 1927 年以抵消日本不断增长的实力所做的那样。但除此之外，菲律宾已呼吁特别是在与马来西亚的争议中，“亚洲问题亚洲的解决”，有点类似于亚洲版的“门罗主义”。同时，菲律宾与柬埔寨签订友好协定，从此两国进入了一个友好与不结盟的新时代，这就是亚洲主义的友好精神，在 1963 年，菲律宾与柬埔寨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柬埔寨接受了菲律宾提出的试图与美国“消除隔阂”的方案。<sup>③</sup>

### 第三节 东南亚地区格局的新变化对菲律宾外交调整的影响

#### 一、冲突到合作：东南亚一体化的曲折进程

第三世界领导人对地区主义和区域组织有很大的兴趣，从他们举行很多国际组织和举行很多会议和论坛可以反映出来。这些活动，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正式组织，组织内西方列强往往在其创建和运作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一组中包括 1947 联合国经济委员会亚洲及远东（ECAFE），1951 科伦坡计划，1957 东南亚条约组织（东盟），和 1965 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相比之下，第二类组织往往主动性在本区域内，不正式，经常举行一两次重要会议，这些组织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第一次把亚洲人民汇集在一起。这些组织也以成员的不同身份进行区分，反映了地区和地区组织不同的理念。第二类中包括 1947 届亚洲关系会议和 1955 年万隆会议。在讨论东南亚的地区主义和地区组织的历史时，几乎都会举出上面的例

<sup>①</sup> State of the Nation Message of President Macapagal, January 26, 1963.

<sup>②</sup> 1964 年 6 月 2 日，马卡帕加尔于日本东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

<sup>③</sup> Sunday Telegraph[N]. Sydney, December 29, 1963.

子，但需要重要的是直到 1961 年才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组织，无论在成员国身份上，还是在创建过程上都很特别。

在这个时间段，创建东南亚组织对于东南亚来说是低级的本土利益，造成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帝国主义刚刚在这结束。盟军可能已经击败了日本，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试图收回他们失去的殖民地。例如，在 1947 年，在东南亚地区只有泰国和菲律宾是独立的。在未来的 10 年里，超过六个国家将获得他们的独立，但直到 1976 年，所有东南亚的独立才最终实现。从外国的多年统治中摆脱出来，这些东南亚国家才刚刚培养出国家意识，建国思想被认为是与东南亚没有多大关系的。1947 年 7 月，来自印尼、马来亚，越南、柬埔寨、老挝和泰国的代表，发出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宣言，但鉴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紧迫问题，很少出现这种象征性的集体声明。个别国家还没有完全独立，更不用说一个地区。

战后在出现的所有反共产主义的区域组织中，东南亚条约组织可能是最有名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是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后的 1954 年成立，它建立的目的是阻止共产主义扩张到东南亚，并支持泰国，最终使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预合法化。东南亚条约组织是由带有不同利益的不同成员国组成，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东南亚条约组织，从开始就饱受争议。因为亚洲国家担心东南亚条约组织公开的反共产主义背后的目的，并且组织是由美国主导，所以美国是不可能吸引更多的亚洲成员参加的。

只有两个成员国是来自东南亚，所以东南亚条约组织无论是在成员上还是身份上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组织，但它对东南亚地区还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东南亚联盟特别强调了像东南亚条约组织一样混杂的组织所在的区域中，大国的利益占主导地位。东南亚条约组织被认为在东南亚造成更多的是区域分裂而不是统一，东南亚条约组织和过度的渲染中立及敌视共产主义国家，而在 1967 年东南亚联盟接受东南亚中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敌对的越南。纳撒尼尔裴菲（Nathaniel Peffer）在谈到东南亚条约组织时，把它放在 1954 年这样的背景下：“要想有意义，有现实或者有力量，这样的组织必须在非常强烈的本地情况下出现，并且有当地居民自发的坚持……简单的说，东南亚条约组织应该是东南亚的，而不是华盛顿的，然后起了一个徒有其表的名称。”

在 1958 年和 1965 年，东南亚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特征就是新兴的区域意识和区域内的冲突一样多。然而广阔的亚洲继续为许多组织和论坛提供基础，例如，亚洲及太平洋理事会，亚洲开发银行，亚洲生产力组织和亚洲经济发展委员会，在东南亚的这些组织，受区域组织的思想和趋势的鼓舞，也开始思考组织方面应是特定的东南亚组织，并能够体现东南亚自己的特征与主动性。随着东南亚国家获得独立并习惯于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他们开始寻找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在更广泛的范围参加国际组织，并在影响他们的问题上采取更大的主动性。正如乔根森·达尔写到的“好像只有在这个时期，他们才开始认识到他们是自己国家的主人。”<sup>①</sup>

正如已经提到的，国与国的差异问题，他们已经在早期亚洲会议、提议和组织上意识到，但是随着东南亚国家对邻国事务有更大的兴趣，它也很快成为东南亚政治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东南亚条约组织强调的，在东南亚产生的共产主义，给与坚决的抵制，还有和中立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例如印尼虽自称民主自由，但其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在领土和边界上的争端，很多是殖民地时期的遗留问题，都进一步扩大了后殖民时期的冲突基础。这些边界争端还导致争端区域内的民族方面的紧张局势，人民被纳入还没有共同标志的国家。这种紧张局势往往源于一个国家指责他的邻国对待特殊群体的态度，但也会涉及到分裂运动，指控邻国帮助分裂的叛军。最后，在 1958 年到 1965 年这段时间也能看到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仇恨转变成更加严重的国家关系问题。<sup>②</sup>

从 1958 年到 1965 年间，东南亚国家间关系是极度紧张的，彼此之间恶言相向，封锁不断加强，并且由于驱逐而形成新的国家，所有这些导致这个时间段的东南亚紧张局势，也造成区域合作与组织产生新的障碍。此外，因为这些紧张局势是表面的，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解决这些问题的政治意愿不足，而且东南亚地区主义发展“我们”意识的不足，以及东南亚多次讨论的多样性被阻碍。他们的区域内的问题和差异说明，虽然地理上的接近可以有助于共同的观点和利益，但它也是冲突的根源，会加剧区域紧张局势。1966 年，兴起于东南亚国家关系动荡时期的新加坡前任总理李光耀，在这个问题上表达得很好：“对于国家最奇怪

<sup>①</sup> Jorgensen-Dahl .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11.

<sup>②</sup> Bernard K. Gordon. Problem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J].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64 : 222-253.

的是：你最好的朋友，永远不是你的近邻！他们靠得太近，你邻居的篱笆长了就会侵犯到你花园的部分，他水果树的分支覆盖到你的草地，你的玫瑰就无法得到足够的阳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会发生！因此，正如发生在许多其他国家的一样，我们最好的朋友是那些更远地方的国家，我们彼此能进行客观谈判。”<sup>①</sup>

## 二、菲律宾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认同与回应

菲律宾关于东南亚联盟的谈话、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司令部、法国提出的包括泰国以及包括印尼的泛东南亚联盟，这些实体都表明东南亚这一时期存在的一些概念，耐人寻味的是，上述各种东南亚组织，尽管他们都有“东南亚”这样的名字，并包括不同的成员，然而却没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东南亚国家。简而言之，在1958年之前，地区主义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提出关于东南亚的内容和特性。尽管他们可能拥有东南亚地区的成员身份，也就是说，实际上，一些或全部的“东南亚”的参与者，在许多情况下是追随大国形成的偶然性，相反，他们做的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种族和宗教方面考虑，务必使每个竞争者都做到他们人民的忠诚和政治的忠诚。

东南亚联盟（ASA）由菲律宾、泰国和马来亚创建，这三个国家一改之前在东南亚对地区和地区组织的想法，与泰国的湄公河流域的佛教国家的结合和菲律宾的泛马来主义不同，ASA跨越宗教和种族，为代表东南亚的地理和政治而服务，在创建ASA时，其创始人强调区域自决和自力更生的主旨，在成员方面使组织专门且要求只有东南亚国家才能加入。尽管东南亚联盟被创造了一个更加独立的外形，但同样在反共意识形态上更加显著。这三个国家在当时表现为最亲西方和反共，为了反对国内和国际的共产主义，促进本区域的合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

在初期的历次部长会议上，菲律宾、泰国和马来亚都尽力扩大ASA的成员，尽管每位成员都对ASA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菲律宾，比较专注于ASA的经贸关系。ASA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试图提供一种自主选择主导的，像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一样军事安排。与东南亚条约组织不一样的是，ASA专注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内部和外部威胁的第一道防御。

ASA存在不到一年，菲律宾就挑战马来西亚，索要沙巴领土主权。纠纷最终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彻底决裂。虽有争议，但ASA并没有因此解散。沙巴争

<sup>①</sup> Alex Josey, Lee Kuan Yew[M]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68, Volume1: 327-328.

端仍未得到解决,这其中涉及到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财产和所有权问题,民族问题,殖民历史问题,腐败和不确定性皇室血统的复杂组合。1961年5月马来西亚东姑阿都拉曼提到马来西亚新联邦的形成将包括新加坡,沙巴,文莱,和沙捞越地区<sup>①</sup>。提出了联邦的范围包括婆罗洲北部地区,是基于吉隆坡的理解:苏禄苏丹<sup>②</sup>将沙巴的所有权转让给一家英国贸易公司,后转交到英国王室,然后转交到马来西亚/马来亚。菲律宾反对的理由是,苏禄苏丹仅仅是租赁给英国贸易公司,而不是割让,该地区是英国贸易公司的区域问题<sup>③</sup>。这就是沙巴争端的起源,挑起印尼和菲律宾与马来西亚联邦的争端是实际是英国一手设计的,并加重了“马印对抗”严重性。

在菲律宾的部分对东南亚地区主义的认同是出于国内国外的政策和考虑。例如,因为美国是英国的联盟,所以他是支持马来西亚联邦的,菲律宾因为美国扣押菲律宾的烟草装运事件<sup>④</sup>,借沙巴问题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能考虑到紧迫的菲律宾沙巴主权要求和挑战马来西亚的成立(马来西亚与印尼也有争端),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会解释说菲美关系固然很重要,但同时表明菲律宾与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尤其与它的邻居印尼的亲密关系,虽然印尼是菲律宾既敬畏又害怕的国家。

根据一份受马卡帕加尔委托的报告来看,沙巴能提供菲律宾快速结束被当做美国亚洲傀儡的机会,“提高我们在亚洲同胞心目中的威望,他们到现在都倾向于把我们当做亚洲傀儡。”但是,为了实现它的政治目标和证明它是亚洲的,反西方的,在联邦成立之前与“英国的正面对峙”<sup>⑤</sup>(与吉隆坡的态度截然相反)是重要的。然而,在最后,沙巴宣言对于菲律宾在它邻居中的形象并没有起什么作用。马来西亚领导人视菲律宾突然的宣言,与印尼突然的友谊为“一种试图给他们施压的愤世嫉俗的尝试,也表明菲律宾政策相当的肤浅。”<sup>⑥</sup>同时,印尼也质问马尼拉仅仅两年就从反对马来西亚的立场中退出。<sup>⑦</sup>更重要的是,1963-1964

<sup>①</sup> Mubin Sheppard. Tunku: His Life and Times[M]. Kuala Lumpur: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5: 139.

<sup>②</sup> Narciso Ramos (Secretary of Foreign Affairs) Philippines Brings the Sabah Dispute to the UN, Manila: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1977.

<sup>③</sup> Bernard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6: 14.

<sup>④</sup> Bernard Gordon, Problem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M]. World Politics, January 1964: 225, 227.

<sup>⑤</sup> Bernard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6: 22- 23.

<sup>⑥</sup> Bernard Gordon. Dimensions of Conflict[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66: 21.

<sup>⑦</sup> Jorgensen-Dahl.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年沙巴争端和马印对抗，说明东南亚地区关系的脆弱，那个时间段的东南亚存在着种族、意识形态和区域的关系。就像约根森·达尔说的，1962年到1964年的“沙巴岛问题（涉及马尼拉与吉隆坡）比ASA问题更多”。<sup>①</sup>

---

pp190-212.

<sup>①</sup> Jorgensen-Dahl .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n[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pp 25-30.

## 第四章 马卡帕加尔政府留下的外交遗产

### 第一节 对菲美关系的后续影响

首先是对菲美关系的持续影响。六十年代中期起，在国际国内反美浪潮的推动下，菲律宾政府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有所发展。70年代以后，菲律宾外交政策受到美国的影响开始减少，逐步独立地制定符合自己民族利益的政策。

首先，几经波折，通过马科斯总统和菲律宾国会的共同努力，菲律宾于1968年底全部撤回了赴越南参战的全部军事人员。其次，马科斯总统和克拉松总统分别通过与美国政治协商，最终为菲律宾收回了桑莱岬美国海军基地和苏比克海空军基地，这对于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关于军事基地问题的谈判是突破性的一步。最后，在经济方面，对于期满的带有殖民色彩的不平等的劳雷尔—兰格雷协定，到1974年不在执行，也反对用类似条约代替。同时，菲律宾政府废除了“同等权利案”。与美国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军事基地谈判，终于在1979年1月正式签订了美国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协定的六点修正案。修正案规定，正式承认菲律宾对这些军事基地的主权；任命菲律宾人为军事基地司令；由菲律宾武装部队担负维持基地外围的治安任务，美国继续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保证美国在基地内的军事业务不受阻碍；保证每五年进行一次对军事基地协定执行情况检查；美军不能介入菲律宾内部冲突，但当菲律宾遭到外来侵略时，菲政府可以请求美国的援助。1982年12月，菲美双方又签署了菲律宾在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内实施关税、移民和检疫法律的规定。这是自1946年菲律宾独立以来第一次在美国控制区内实施本国法律。这些致使美菲关系发展到一个冰点。但是，面临着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威胁，菲律宾政府鉴于自身和地区的安全，越来越觉得在军事上还要依靠美国。为了吸收更多的外资和外汇，在经济上还要有赖于美国。因此对美国的“离心”不敢走得太远。

马卡帕加尔留给菲律宾的外交遗产相当丰厚，至今影响着菲律宾的领导人和菲美关系走向。当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表现出了对美国更大的离心力，杜特尔特在重要场合多次表示：“希望我在执政期间，菲律宾的国土上只有菲律宾士兵，而没有其他国家的军队。”

## 第二节 对邻国关系的持续影响

菲亚关系的持续影响。菲律宾在摆脱美国控制的同时，还努力的发展与亚洲邻国的关系。1967年8月，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在曼谷发表了“曼谷宣言”<sup>①</sup>，筹备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菲律宾再次扮演了发起人的角色，同时还积极的改善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实现了与马来西亚关系的正常化。

1971年1月26—27日，东盟五国外长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特别会议。会议结束时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宣言》，宣布五国“决定初步地进行必要的努力，以便使东南亚成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的任何形式和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得到承认和尊重”。吉隆坡会议后，东盟成员国加强了政治合作，为实现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共同作出努力。1976年2月23日—24日，五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举行第一次东盟首脑会议，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东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协调和经济合作日趋活跃和频繁，开创了东盟合作史上的新阶段。

为了加强东盟内部的团结，1977年8月4日，马科斯总统在吉隆坡第二届东盟首脑会议开幕式上宣布，菲将采取具体措施放弃对沙巴的主权要求。会议结束后，马科斯总统和夫人应侯赛因总理邀请访问了沙巴。马科斯总统在沙巴首席部长哈里斯为他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表示，他此行的任务是向沙巴人民宣布，菲律宾政府及其人民都认为沙巴是马来西亚领土的一部分，1980年2月，马来西亚里陶丁外长应邀访问菲律宾，同菲外长罗慕洛会谈，马科斯总统会见了里陶丁外长。

日菲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加长足的发展，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菲美关系的松懈，菲律宾对日本的态度有所改变，两国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1967年3月，菲律宾政府同意日本企业在菲律宾设立分公司和进行企业经营活动。1973年12月，菲律宾国会批准了拖延了13年的《日菲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历届新上任的首相都对菲律宾进行过友好访问。1977年4月，应日本首相福田的邀请，马科斯总统访问了日本，与福田签署了日菲经济合作的联合公报。两国希望保持和扩大日本在菲律宾的私人投资。1979年5月10日，马科斯总统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重新修订了《日菲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纠正了旧协定中对菲律宾不利的因素，为两国之间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更牢固的基础。1983年5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到马尼

<sup>①</sup>金应熙. 菲律宾史[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0, 第 757 页。

拉作正式访问，马科斯在欢迎词中指出菲日关系是“维护亚洲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sup>①</sup>。

### 第三节 外交调整带来的新突破——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

与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是外交调整带来的新突破。菲律宾外交政策另一个突破点是与建国以来从未打过交道的共产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早在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已有人提出与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贸易，主张购买中国的大米用以解决菲律宾的粮食危机，同时也有少数政治家、记者和学者到中国、苏联访问，马科斯和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国大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允许菲律宾的贸易代表团等访问中国，不加任何阻挠，进而到1975年马科斯夫妇亲访北京，菲律宾与中国正式建交，随后的克拉松和拉莫斯也都在任职总统期间对华进行友好访问。在中菲签订的联合公报中，双方政府认为，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五项基本原则指导下，两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不应妨碍两国人民发展和平友好关系。针对菲政界及国防部某些人士对中国可能支持菲共产党人的疑虑，联合公报强调，谴责任何国家以颠覆或其他方法控制别国或干涉别国内政。毛主席在接见马科斯及其家人时，还亲自保证，中国不会推翻或剥削菲律宾，中国无论如何无意把其社会制度强加给菲律宾。<sup>②</sup> 中菲建交标志着菲律宾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多极平衡外交政策的形成，从而结束了长达二十多年的亲美反共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互动，菲律宾领导人在马卡帕加尔做出的外交调整基础上一个突破自我孤立的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后来被称为“发展外交”<sup>③</sup>。

<sup>①</sup> [苏]弗·格·莫罗佐夫，施纯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菲关系[J]. 《东南亚研究》，1986，（1），第78页。

<sup>②</sup> 菲《时代日报》1975年6月7日，第一页。

<sup>③</sup> 1969年1月2日卡洛斯·罗穆诺被马科斯总统任命为菲律宾外长，他在就职仪式上发表了关于菲律宾外交新方向的演说，被媒体称为“发展外交”的缘起。

## 结语

2016年10月6日，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赛发表声明，强调菲政府将摆脱对美国依赖，追寻独立外交政策。紧接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于访华，开启了自南海仲裁案后中菲两国间的破冰之旅。这并非菲律宾领导人第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自身的外交政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马卡帕加尔总统在顶住菲美特殊关系的压力下，毅然开启了菲律宾转向亚洲外交的新航向。

马卡帕加尔经常宣称菲律宾需要更广泛的视野和与邻国更为密集的区域关系，这是菲律宾外交政策的两个主要问题。还有他的第三项政策，也就是他经常表达的野心：使菲律宾政府在他任内，国家真正成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看来经济是决定菲律宾外交航向的主要动力。这些就是马卡帕加尔外交政策的三大主题，所有关于他的外交政策演说，这三个主题都占有很大比重，但也并不是说明这三个问题能够很很容易地协调。

马卡帕加尔就任总统之时，也正值亚洲局势发生急剧变化之际，反帝、反殖和反霸的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东南亚，印支三国取得抗美斗争的胜利。在菲律宾国内，由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潮流喷涌而出，马卡帕加尔审时度势，从民族利益出发，调整菲律宾的对外政策。马卡帕加尔从对美和对亚两个方向同时着手，采取不同的政策，以期达到同样的目的——“把菲律宾的命运从西方转移到东方”<sup>①</sup>。马卡帕加尔做出的外交调整，是菲律宾外交走向一个及其重要的分水岭，纵然最后马卡帕加尔并没有连任，但其以后的继任总统们都沿用着他所尝试的外交模式，直到现在，菲律宾俨然成为一个由内而外的亚洲国家，菲领导人更加希望能和除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建立更广泛的安全机制，而不是简单的依赖美国。

<sup>①</sup> E.D.Solidum. Philippine Perceptions of Crucial Ensnues Affecting S.E.Asi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Vol.22, 1982,p538.

## 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成果

1. 《马卡帕加尔政府时期菲律宾外交的亚洲转向研究》发表于《东南亚纵横》2016年第4期
2. 《浅析独立初期的菲律宾对外关系演变》发表于《中外交流》2016年第18期
3. 《再论“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的合理性问题》发表于《重庆科技学院（社科版）》2017年第2期

## 参考文献

### (一) 档案资料

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为 FRUS), 1945, Vol. VI,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9.
2. FRUS, 1958-1960, Vol. XV,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3. FRUS, 1961-1963, Vol. XXIII,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5.
4. Diosdado Macapagal's First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Delivered on January 22, 1962 at the Legislative Building, Manila.
5. Diosdado Macapagal's Second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 Delivered on January 28, 1963 at the Legislative Building, Manila.
6. Diosdado Macapagal's Third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Delivered on January 27, 1964 at the Legislative Building, Manila.
7. Diosdado Macapagal's Fourth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 Delivered on January 25, 1965 at the Legislative Building, Manila.
8. Diosdado Macapagal's Inaugural Address, Delivered on December 30, 1961 at the Rizal Park, Manila.
9. Part of text of a message from Philippine President Diosdado Macapagal regarding his hopes that representatives from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ttend a tripartite meeting to solidify Maphilindo, a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 ,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1964-1-14
10. WH meeting between Eisenhower and Philippine Vice President Diosdado Macapagal, topics include: assassination of Japanese Socialist leader; and success

- of U.S.-Philippine relations , WHITE HOUSE ,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1960-10-13
11. Cable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an Rusk from Ambassador Stevenson on a meeting with Philippino President Diosdado Macapagal to discuss the dispute betwee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and the future of U.S. and Phillipine relations with Indonesia , Department of State ,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1964-1-14
  12. Philippine Elections (close presidential race between Diosdado Macapagal recent indications of the slow undermining of the Salazar dictatorship's public standing).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OCI No. 1269/62. May 6, 1962. 5 p. SECRET. Declassified June 21, 1977
  13. Summary of 6/3/58 NSC meeting: significant world developments affecting U.S. security; U.S. foreign relations with the Philippines, Greece, and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58-6-3
  14. Philippine Elections (close presidential race between Diosdado Macapagal and Ferdinand Marcos; likelihood of vice presidential victory for Gerardo Roxas; the issues and the campaign; implications of elections to US; capabilities of the candidates). 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 Office of Current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OCI No. 2343/65. Oct. 28, 1965. 8 p. SECRET. Declassified May 17, 1977. Johnson Library, NSF, Countries, Philippines, Vol. 2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1965-10-28
  15. The Philippines, U.S. Policy toward. Transmittal Memorandum, Roy to The Philippines, U.S. Policy toward. Transmittal Memorandum, Roy to James S. Lay, Jr., Exec. Secy, NSC. Sept. 6, 1957.
  16. Chester Cooper and McGeorge Bundy's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utheast Asia. Topics include: mobilization of South Vietnamese armed forces; developments affecting the Montagnards (South Vietnamese tribesmen); Cambodian diplomatic initiatives; Burma's neutrality regarding Vietnam;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ailand; anti-American press campaign in Singapor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Laos; Indonesian demonstrations; guidelines for U.S. military bases in the Philippines;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South Korea; U.S. relations with Japan; Chinese representation at the UN [White House](#) 1965-9-23

(二) 英文著作

1. M. Quezon: Good Fight,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Press, 1946.
2. Shirley Jenkins: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Toward the Philippin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3. G. F. Zaide: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History, Government, and Civilization ), Manila: Rex Book Store, 1963.
4. Milton Walter Meyer: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Republic,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65.
5. Agoncillo, Teodoro A: Filipino Nationalism, 1872-1970, Quezon City: R. P. Garcia Pub, 1974.
6. Abaya, Hernando J: The Untold Philippine Story, Quezon: Malaya Books, 1969,
7. Fifield,Russell Hunt, Americans in Southeast Asia: the roots of commitment, New York: Crowell,1973.
8. Fifield, Russell Hunt: Southeast Asia in United States Policy,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3.
9. Golay, Frank H: The Philippines: Public Policy an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1.
10. Hartendorp, A.V.H: History of Industry and Trade of the Philippines, Manila: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Philippines, 1961.
11. Herring, George C. Jr: America &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McGraw-Hill, 1996.
12. Kim Sun Yong: United States-Philippines relations, 1946-1956,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Press, 1968.
13. Madis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1961-1965: Was Ther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14. Ohno Takmshi: War Reparations and Peace Settlement: Philippines-Japan Relations 1945-1956, Manila: Solitarian Publishing House, 1986.
15. Taylor, George E: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4.
16. Meyer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 Republic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1965
17. Vellut : 《The Asian policy of the Philippines, 1954-61 》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1965
18. Roger M. Smith: 《Two papers on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 , s.n.1959
19. Thompson : 《Unequal partners 》 , Lexington Books , 1975
20. Pomeroy :《American neo-colonialism 》 ,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0
21. Lichauco : 《imperi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 ,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3, (关于经济类的)
22. Taylor, George E.,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oblems of Partnership, New York & London: Frederick A. Praeger Inc., 1964.

(三) 英文论文、报告:

1. Michael Mcphelin: Financial Achievement of 1960,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No. 1.
2. John J. Carroll: Philippine Labor Union,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No. 2.
3. Michael Mcphelin: Chinese Question,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1, No. 2.
4. Francis C. Madigan: Study Of Social Change,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2, No. 4.
5. H. Kng Hedinger: Toward Greater Philippine Exports,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1.

6. Frank Lynch: Today's Native Is Yesterday's Visitor,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3.
7. Mary R. Hollnsteiner; Frank Lynch: The Philippines,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3.
8. John E Doherty: Marx And The Sociology Of Change,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4.
9. John J. Carroll: The Twine Revolution,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4.
10. Femando S. David: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Treasury,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4.
11. Jacques Amyot: Chinese Overseas Emigration, Philippines Studi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63, No. 4.
12. David Wurfel: The Phillipines: Intensified Dialogue, Asian Survey, Jan, 1 967. Ferdinand E. Marcos: State of the Nation Address, Jan. 23, 1967.
13. Corning, Gregory P: "The Philippine Bases and U.S Pacific Strategy" , Pacific Affairs, Vol.63,No. 1, Spring, 1990.
14. H.B.Jacobini : " Main Patterns of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23, No.4,Oct., 1961.

(四) 中文著作和译著:

1. [台]萧曦清: 《中菲外交关系史》, 正中书局, 1995.
2. 天一出版社资料室: 《菲律宾外交》, 天一出版社, 1980
3. 梁英明等 《东南亚近现代史》上下册, 昆仑出版社, 2005年版。
4. 梁志明主编: 《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 王民同主编: 《东南亚史纲》, 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6. 尤波辉: 《菲律宾》,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年。
7.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国际条约集》(1953- 1955),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年版。
8. D. G. F. 霍尔: 《东南亚史》下册, 商务印书馆,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译, 1982年

9. 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下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0. 约翰·F·卡迪:《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11. 陈烈甫:《菲律宾与中菲关系》, 南洋研究出版社, 1955年。
12. 陈烈甫:《菲律宾的资源经济与菲化政策》, 台北: 正中书局, 1969年。
13. 陈烈甫:《菲律宾对外关系》, 正中书局, 1977年。
14. 金应熙等编:《菲律宾史》, 开封: 河南人学出版社, 1990年。
15. 陈衍德:《对抗、适应与融合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族际关系》,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年。
16. [菲]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 吴世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年。
17. [澳]托马斯·艾伦著:《东南亚国家联盟》, 郭彤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
18. [台]怀静如著:《菲律宾外交政策: 1946-1984》,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19. [法]鲁塞尔·法菲尔德著:《美国政策中的东南亚》, 群力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年版。
20. [澳]托马斯·艾伦著:《东南亚国家联盟》, 郭彤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1年版。
21. 王玮著:《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 1776 - 1995年》,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2. [美]约翰·卡迪著:《战后东南亚史》, 姚楠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 1984年版。
23.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下册),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

#### (五) 中文期刊论文:

1. 邹志明:《战后美菲关系中的战争损失赔偿问题探析》,《南洋问题研究》, 2013年第1期。
2. 邹志明:《战后美菲同盟的形成与演变研究(1946-1975)》, 华中师范大

学,2013年,博士毕业论文。

3. 时殷弘、许滨:《来自冷战外的挑战——美国在菲律宾的失败与调整 1945—1954年》,《美国研究》,1995年第2期。
4. 韩君:《美国对菲律宾政策的演变 1946—1960年》,暨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5. 时羽卓:《马科斯时期的菲美关系演变 1965—1986》,吉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6. 汪春杰:《冷战初期美国对菲律宾的干涉》,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7. 包茂宏:《论菲律宾的民族问题》,《世界民族》,2004年第5期。
8. 陈衍德:《东南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4期。
9. 陈衍德:《再论东南亚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主义》,《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
10. 陈衍德:《全球化、现代化与东南亚少数民族的边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11. 巨永明:《资本全球化视野下的20世纪民族主义》,《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6期。
12. 赵焯:《资本全球化视野下20世纪60年代的菲律宾民族主义》,河南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13. 邹珊:《沙巴对峙:不只是领土争端》,三联生活周刊,2013,11。
14. 郑芸艳:《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东南亚沙巴领土争端中的角色及作用》,中山大学,2013,硕士学位论文

(六) 网络资源:

1. [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s28\\_yts1.htm](http://www.cass.net.cn/chinese/s28_yts/s28_yts1.htm) 中国社科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
2. <http://www.nlc.gov.cn/GB/channel1/index.html> 中国国家图书馆
3. <http://www.jnuir.org/>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4. <http://www2.nsysu.edu.tw/cseas/> 台湾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5. <http://www.ncku.edu.tw/~cseas/> 台湾成功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6. <http://www.ncca.gov.ph/ncca-rmao>. 菲律宾国家档案馆
7. <http://www.dfa.gov.ph/> 菲律宾外交部
8. <http://www.ateneo.net/> 菲律宾大学
9. <http://www.balita.org/> 菲律宾联合日报网站

## 感谢语

时光荏苒，转眼间研究生三年过去了，随着毕业季的来临，三年的求学之路也即将结束，回望所经历的这个时期，内心总是充满热泪与感动。有初入校园时的豪情满怀，有遭遇挫折困惑时的惆怅无助，有谈天说地、指点江山时的淋漓兴致，有挑灯夜战、寒窗苦读时的奋发进取。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朱大伟老师，承蒙老师不弃将跨专业的我招入门下，我才有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作为一位睿智敦厚的长者，您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我谆谆教诲，在生活上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在人生的际遇问题上教会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您渊博广深的学术功底、严谨专精的治学态度以及宽厚谦和的品行气质，将成为我学习的榜样。当然，这里还必须提到我的毕业论文。论文从选题到构思、撰写和修改，直至最终定稿，您都倾注了大量心血。为谢师恩，本想呈上一份满意答卷，但遗憾未能尽善尽美，惟有今后加倍努力！

其次要感谢的是魏炜老师、龚子方老师、刘红良老师和钟贵峰老师等诸位老师。他们的精彩授课，以及对我的培养教导，使我在三年的时光中顺利地完成硕士课程，学到无数理论和人生知识，这些对我以后的人生之路大有裨益。还有班主任穆朝阳老师和袁老师在生活上给予的帮助，让人难以忘怀，他们的微笑值得我永远记忆。

再次是要感谢 14 级文旅学院研究生所有同学，论文的写作是一个不断锤炼的长期过程，期间经常出现精神上的倦怠，但是由于你们，我得到了许多心灵上的慰藉和现实的帮助。不仅如此，与博学而又正直的你们朝夕相处，我更加感受到学术的魅力、生活的美好以及友情的可贵。

最后感谢我远在河南的家人。父亲的坚韧与淡薄、母亲的豁达与善良，教会了我坚强、平和和乐观地面对人生。我依然记得当初为了读研而辞去工作时矛盾的心情，爱人用尼采的话鼓励我“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一定程度的贫困。”以坚定我求学之路的决心，现在想起心中仍感到无限温暖。

几句言语难以表达我心中的感激之情，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会牢记教诲，加倍努力，以所学才能奉献社会，无愧于赣师大对我的培养。